

## 附錄一 辜鴻銘著作引文的翻譯及說明

註 1 辜鴻銘喜歡用“civilization”代替“culture”，他如此解釋“civilization”的源起：

「所有文明（civilization）乃由征服自然（nature）而開始，亦即開始於壓抑與控制自然之中能夠傷害人類的暴力。歐洲的現代文明已經成功地征服自然，吾人一定要承認，直到今天，歐洲文明征服自然的成就，是任何其他文明無法趕上的。」見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I. 由此可知，辜氏所以要用“civilization”而不用“culture”，明顯就是爲了要與「自然」相對，而且是針對歐洲的物質力量而來。不過，這種征服自然的物質力量只是文明的開端而已。因此他又表示：「文明的資產不是這個國家裡的貿易、鐵路、礦產、金、銀、鐵、煤。今日世界的文明資產，我在這裡想說的，是中國人——擁有良民宗教而未被破壞的真正中國人。我認爲，真正的中國人是一種無價的文明資產，因爲他是一種世人不需花費就能讓他遵守秩序的人。」*ibid.*, p. IX. 故辜氏主張，真正的文明不是物質力量，而是指一種精神力量，也是一種「自律」的教養。辜氏在“Civilization and Anarchy”一文裡，曾以韓國的上層階級與中國人民爲例，對「文明」作了一番詳細的闡述，詳情可見辜氏所著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一書的第 179 頁至 181 頁。該書在西元 1901 年由上海的 Shanghai Mercury 出版。

註 2 *Ibid.*, p. V. 譯文爲「今日歐洲文明的基本缺點，依我看來，在於它對人性的錯誤觀點；它認爲人性爲惡，而且因爲這個錯誤觀點，使得歐洲的整個社會結構必須經常依賴武力（才能穩定）。歐洲人民必須依靠兩件事來維持國內秩序，那就是宗教與法律。」按：辜氏認爲歐洲文明有一個重大缺點，就是主張人性是惡的，因此要依靠外在的力量來約束自己。宗教與法律就是兩個外在的力量，但自從物質力量發達以後，宗教已失去了約束的力量，而法律又要依靠警察與武力來維持，如果警察與武力稍行式微的話，無政府狀態又會肆虐而起。他認爲歐洲社會將陷入軍國主義與無政府狀態永恆輪替的泥淖之中，這種難以修復的缺陷起因於歐洲缺少一種道德力量，故不如以儒家思想來教化歐洲人民，讓他們相信人性本善的的道德力量，相信君王之善，進而尊敬君王。在政府與人民彼此信任的情況下，無政府狀態自然不會出現，軍國主義也將消弭於無形。

註 3 這個說法來自辜鴻銘對《大學》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文字的英

譯：“Men in old times when they wanted further the cause of enlightenment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began first by securing good government in their country……When there is good government in all countries, and only then, will there be peace and order throughout the world.”見 Ku Hung-ming, *Higher Education*, pp. 7-8. 譯文為「當古代的人想在世界上推動教化與文明的事業，他們先從自己國家獲得良治開始……當所有國家都有了良治以後，於是乎全世界才有秩序與和平。」因此，在辜氏看來，世界真正文明的內容，就是秩序與和平，而它的基礎則是良治。

註 4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II. 譯文為「在過去可以有效壓制與控制人類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現在這場被軍備所引導的戰爭，似乎顯示了基督教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效的道德力量。沒有了壓制與控制人類激情的道德力量，歐洲人民已經再度利用武力來維持國內秩序。」

註 5 *ibid.*, p. II. 譯文為「使用武力來維持國內秩序導致軍國主義。事實上，因為缺少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軍國主義在今日的歐洲是必要的。但是軍國主義將導致戰爭而戰爭意謂毀滅和浪費。因此，歐洲人民現在進退維谷。如果他們廢止軍國主義，無政府狀態將摧毀他們的文明，不過如果他們保持軍國主義的話，他們的文明將因為戰爭的浪費與破壞而崩潰。」

註 6 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23-24. 譯文為「正如我說的，介於心靈與頭腦之間的這場衝突出現在兩千五百年之前，正如我們目前在歐洲所看到的。在人們試著重建的社會與文明的新秩序裡，這種心靈與頭腦的衝突讓中國人民對所有文明感到不滿，在這種不滿所製造的憤怒與絕望裡，中國人民想要拆毀與破壞所有文明。」

註 7 Ku Hung-ming, “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No. 5.],” pp.

164-165. 譯文為「那就是武士道、騎士精神或歐洲真正的軍國主義，它們不同於現代自動機器、警察或粗俗的滑膛槍崇拜。的確，所有軍事美德或武士道的基礎，所有歐洲的真正軍國主義的基礎，在中國和在日本都是一樣的：也就是壓制野蠻與粗暴，支持高貴的、真正的君王制度與壓制人心中的卑劣，或者，就像中國人所說的，『尊敬國王，排除夷狄』（尊王攘夷）。丁尼生使用歐洲方言來詮釋這句中國話的意義，讓圓桌武士發誓：『尊敬國王好像他是他們的良心，尊敬他們的良心好像它是他們的國王，打倒異教徒，支持基督。』」

註 8 Ku Hung-ming, “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No. 5.],” p. 165. 譯文為「一九〇〇年義和拳民的戰爭口號，扶清滅洋（擁護清朝，打到洋人），是與這四個字（尊王攘夷）精神相通的字面轉換。」

註 9 Ku Hung-ming, “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No. 3.],” pp. 117-118. 「卑康斯菲爾德勳爵與俾斯麥大公所試圖建立的，就是一種真正的帝國主義，就是政府擁有專制的權力去做它認為正確的事，事實上它就是公平的政府……卑康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與俾斯麥大公的『血與鐵』制度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巨大的。第一個原因，卑康斯菲爾德勳爵是一位擁有良好想像力的『東方人』，然而俾斯麥大公卻只是一個有文化素養的低地蘇格蘭人，他缺乏想像力，卻擁有自私的傾向與波美拉尼亞大食客的可怖胃口！然而這兩個制度之間的基本差異就是，卑康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試圖要成爲一種憲政的帝國主義，然而俾斯麥大公的帝國主義卻是十足地一個軍事帝國主義。」

註 10 Ku Hung-ming, “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Civil Service in China Part 1,” p.472. 譯文為「卑康斯菲爾德勳爵說他第一次了解大不列顛的政治狀態，當他發現所謂的中產階級與倫敦佬組成的自由黨確實是一個寡頭集團（the oligarchy）。卑康斯菲爾德勳爵於是領導暴民來幫助紳士們拉倒倫敦佬和寡頭集團。在摧毀寡頭集團後，卑康斯菲爾德勳爵看到了暴民們無法統治國家，他因此宣布了帝國主義。」

註 11 Ibid. 譯文為「卑康斯菲爾德勳爵宣告帝國主義，亦即公平政府擁有專制權力（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with absolute power），從內到外，無所畏懼或無所偏私地去做它認為對國家的良治正確與最好的事。卑康斯菲爾德勳爵事實上，真的讓自己成爲一個獨裁者，而且可以稱他爲一位憲政的獨裁者。」

註 12 Ku Hung-ming,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 pp. 66-67. 「我在這裡將進一步提及科舉考試的停辦，除了正義的問題外，我在這裡將指出的是，中國辦理科舉考試不像歐洲人民的選舉權，它毋寧是一種功能，一種重要的功能，讓中國政府得以執行開放門戶的政策——對所有人開放在政府服務裡的職業。現在，要求一位工程師應該讓機器正常運作，然而同時又要求他堵住機器裡最重要的管道，因此，我認爲這種行爲將被認爲是極端不合理的。然而，這就是列強要求帝國政府停辦科舉考試的真相。」

註 13 Ku Hung-ming, “Jacobin China,” p. xxiii. 譯文為「在歐洲，國家和教會乃兩個不同的機構，然而在中國，它們是合而爲一的。歐洲的教會是負責人民

道德的機構，而國家主要負責秩序的維持。然而在中國，國家負責兩者，負責人民的道德，也負責秩序的維持。歐洲的教會獲取它的權威來促使人民有道德的源頭是上帝；但是在中國，國家獲取它的權威而促使人民有道德的源頭是國君。」

註 14 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73. 原文為：“……the highest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se rules being the absolute Duty of Loyalty to the Emperor, just as the highest and most important rules of moral conduct in all the Great Religions of the world is fear of God. In other words, the Church Religion, Christianity, says:--‘Fear God and obey Him.’ But the State Religion of Confucius, or Confucianism, says:--‘Honour the Emperor and be loyal to him.’”譯文為「在所有這些道德規範之中，最崇高與最重要的規範乃是對君王的絕對忠誠責任，就像在世上所有偉大的宗教裡一樣，最崇高與最重要的道德行為規範就是對上帝的畏懼。換言之，教會宗教——基督教說：『畏懼上帝而且服從祂。』孔子的國家宗教或儒教則說：『榮耀國君而且效忠他。』」

註 15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94. 譯文為「世界的未來文明有賴於愛默生的美國思想，正如杜克勞斯論及現代自由主義有賴於『理性萌芽』的滋長。更進一步說，愛默生的美國思想乃以中國文明為基礎，或者是以遠東人民所謂的儒家文明為基礎。其中存有遠東問題的道德難題。要解決這個難題，不完全依賴國會，也不依賴君王、總統、國王，也不依賴內閣閣員。要解決這個難題，用愛默生的話說，有賴於在歐洲與美國被發現的最簡易與最純粹的心靈。」

註 16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p. 1-3. 譯文為「『看』馬修·阿諾德繼續說道：『看一看三十年前曾經震撼牛津大學直達核心的偉大運動的過程，如果讀過紐曼博士〈辯護〉的人，就可以看到它被引導去反對所謂的自由主義，結果自由主義勝利了，牛津運動失敗了；我們的殘骸潰散至每個地方。』……一個大約三十年前發生在中國的偉大運動的故事。它在許多方面，與紐曼博士領導的著名英國牛津運動故事如出一轍。我想，講這一故事對於他們或許不無益處。中國那場牛津運動的目標，也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進步和新學的現代歐洲觀念……我們艱苦奮戰了三十年，然而現在我們的事業卻幾乎失敗了。有些人背叛了我們的事業，許多人投了降。」

餘下的所有人現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領導我參加戰鬥的首領，是已故的帝國大臣張之洞。當我兩年前在北京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徹底絕望了。一心只想著怎樣才能獲得更為寬容的投降條件。」

註 17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p. vii.

原文爲：“For Dr. Legge, from his raw literary training when he began his work, and the utter want of critical insight and literary perception he showed to the end...”譯文爲「當他（理雅各博士）開始這項工作時，就顯露出生硬的文學訓練；到最終，他更顯露了對「文學感知」徹底缺乏批判眼光。」

註 18 Ibid., p. viii. 原文爲：“With this object in view, we have tried to make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speak in the same way as an educated Englishman would speak had he to express the same thoughts which the Chinese worthies had to express.”譯文爲「懷抱著眼前這個目標，我們已經嘗試著讓孔子及弟子與一位有教養的英國人擁有一樣的說話方式，如果這位英國人務必表達中國聖賢務必表達的同樣思想。」

註 19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1, 1903, p. 577. 按：辜氏以東京和香港預防瘟疫爲例，使用的方法就是把無論多貴的屋子都剷平殆盡，甚至用火去加以摧毀，從來沒人質疑過預防瘟疫方法的嚴酷性。他強調依照中國的觀點，無政府狀態和瘟疫是同等惡劣的，中國政府把對合法當局的所有公開不敬視爲一種危險的瘟疫或無政府狀態細菌。因此爲了消滅所有蠢蠢欲動的無政府狀態細菌，嚴酷而極端的方法就有其必要了。沿著這種理論，他上綱到「尊王」的高度，申明中國君王是最高合法當局的象徵，對最高合法當局的象徵表達公開不敬，就像瘟疫肆虐到最高點，當無政府狀態細菌散播至無以復加，它們所得到懲罰當然就是死。說到這裡，他緊接著舉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一家哭其如一路哭何」的名言，堅決主張：如果對罪犯施行不適當與思考欠周的寬大，意謂著對那些受他人罪行所苦的人做出十足的殘忍行徑。

註 20 Ibid., pp. 577-578. 按：辜氏在這裡比較了中西執法目的的差異。他認爲

中西的刑事裁判制度的立基不同，中國立基於道德，西方立基於功利。西方懲罰罪犯的動機，只在防止犯罪和保護社會免於遭受傷害與損失。但是在中國，懲罰罪犯的動機卻是憎恨罪犯。簡言之，歐洲政府懲罰罪犯是爲了保護口袋，中國政府懲罰罪犯卻是爲了滿足正義的道德感。歐洲的法學家完全不用道德意識來看待罪犯，只把他們看待成

社會裡應受譴責的一群人，要用一種對社會和政府最無害與最有利的  
方法來除去他們。中國的法學家則與之相反，他們看待罪犯為受到譴  
責的惡棍，在制定懲罰他們的法律時，以譴責犯罪的道德感為指導，  
而這種道德感是必須被滿足的。目前有許多被中國道德家特別譴責與  
嫌惡的罪行，因此為了標誌與表達這種譴責與嫌惡犯罪的道德感，這  
是所有正常健康的人在反對犯罪時應該懷抱的道德感，在中國對這些  
罪行的懲罰有必要伴隨著殘酷與野蠻，否則將不符合性格並非殘忍的  
中國人精神，不符合並非無人性的中國人文化的主旨。

註 21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1, 1908, p. 521. 譯文為「如果不是野心的話，  
什麼是她生命裡的支配動機呢？爲了要回答這個問題，容我描述一個我  
朋友告訴我的場景，它發生在北京的宮廷會議廳裡，就在中法戰爭爆  
發之前。一直支持李鴻章不計代價以求和平的慈禧，在聽到法國砲轟  
福州時，立刻召集所有大臣到她面前。大臣們一致要求宣戰，慈禧卻指  
著當時還是小孩的皇上，對大臣們說：『當你們皇上長大成人和我死了  
以後，如果他高興的話，他就可以丟掉祖宗遺產。但只要我活著，我  
就不許有人說一個女人把祖先留給她爲這小孩保管的遺產給丟掉了。』  
因此我說，慈禧一生中的支配動機，是從早到晚都在致力於將祖宗留  
給她掌管的帝國產業，保存得完整無缺。」

註 22 *North China Herald*, Oct. 7, 1911, p. 34. 大意爲：他認爲在目前爭論中相  
關的原則，並非鐵路國有化，或是提高外國貸款的政策。這個各省人  
民與北京中央政府爭論的真正問題在於：是否現在的中國政府將成爲  
寡頭政治領導，或是成爲一個獲得全體國民完全同意的憲政政府。他  
提到了當年在義和團劇變後，慈禧回到了北京，雖然她準備遵循全體  
國民對中國歐化的心願，但也還是決定中國歐化的執行不能依據任何  
個人的心願，甚至是依據她自己的心願，而只能擁有全體國民的完全  
同意。總之，中國歐化如果是一場革命的話，將是如威靈頓公爵所說  
的「一場依照法律適當進程的革命」。他引用伊藤博文爲威靈頓公爵的  
這句話所做的註解，即：革命性改革的實現要獲得全體國民的同意。  
辜氏認爲李鴻章所以改革失敗，是因爲他試圖藉由寡頭政治的方法來  
執行改革。他接著話鋒一轉，指控當時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他以前  
也是李鴻章寡頭政治集團的一員，如果把改革重任託付給此公，難道  
不會重蹈李鴻章的覆轍嗎？改革不只將會失敗，也會在更大的災難中

結束。

註 23 Ku Hung-ming, "The Empress-Dowager – An Appreciation," p. 124. 譯文為「站在幾個笨傢伙裡的一個格格，是醇親王的第四個女兒，說道：『英國有國王嗎？我早先以為我們的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王呢？』在問了幾個問題後，年輕的皇后終於說話了，『你多無知啊！我知道每個國家都有統治者，有些國家是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共和國而且對我們非常友善，但是我很遺憾我們去那邊的人都是些這麼普通的階層，以致他們會把我們想成都是一樣的人。我想看到的是，有些我們優秀的滿族人能到那兒去，到時候他們將會看到我們真正是什麼樣的人。』」辜鴻銘在這裡刻意提到優秀的滿族人，足見他對滿清政府的耿耿忠心了。

註 24 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6-7. 譯文為「我認為中國人有著憐憫的力量，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全然心靈的生活——一種情感或人類之情的生活。容我首先在這裡舉兩個我所謂心靈生活的實例。」他舉的第一個例子，是他的好友梁敦彥當上了漢口關稅道臺這個官位給梁氏自己的快樂，不是因為喜歡官服上的紅鈕扣，也不是因為從此富有與自足，而是因為他應該高興，因為他的升職能夠讓他住在廣東的老母親高興。第二個例子，是辜氏在海關的一個蘇格蘭朋友，有一天在一個偏僻的港口生病了，那裡沒有外國人可以照顧他。不料一個平日被他視為惡劣流氓的中國僕人，竟然細心忠誠的看護他。這種細心與忠誠，是他無法企盼從一位親密友人或近親那兒得到的。

註 25 Ibid., pp. 44-45. 譯文為「你們將記得我說過為什麼人類大眾永遠感覺需要宗教——我所謂歐洲意義的宗教——那是因為宗教給了他們一個庇護所，這個庇護所就是對一個稱為上帝的全能之物的信仰，在其中他們能為自己的存在找到一種永恆感。不過，我認為孔子傳授而被稱為儒教的哲學與道德體系，能夠取代宗教的地位，能夠讓人類，甚至讓人類大眾不需要宗教。因此，我認為儒教之中，一定有某種東西能夠給予人類，給予人類大眾，和宗教給予的相同的安全感和永恆感一樣。現在，我認為我們已經找到這個東西了。這個東西就是孔子在國家宗教裡教導給全中華民族的對君王的忠誠。」辜氏認為在孔子的國家宗教之前，周公早已建立了家族宗教。他表示「換句話說，孔子的這種國家宗教創造了一種忠誠契約的誓言。正如家族宗教藉由婚姻誓言，

讓妻子一定要對她的丈夫絕對忠誠一樣；藉由孔子教導的國家宗教建立的所謂名分大義或榮譽法典的忠誠契約誓言，中國人民一定要絕對地效忠君王。」 *ibid.*, p. 41. 由於家族宗教產生在國家宗教之前，因此辜氏把前者比擬成基督教的舊教規，把後者比擬為新教規。又云：「現在孔子在他傳授的國家宗教裡，將一種新教規給了存在他的時代之前的家族宗教。換句話說，孔子在他傳授的國家宗教裡，給予君子之道一種新的、更寬廣的、更綜合的應用。正如家族宗教，或者是在他之前的中國舊教規的宗教創立了婚姻誓言，孔子則在給予國家宗教裡的君子之道這種新的、更寬廣的、更綜合的應用的同時，設立了一種新的典範。」 *ibid.*, p. 40.

註 26 Ku Hung-ming, "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pp. 221-222. 譯文為「不過，有一點，胡適教授讓我們了解他的文學革命想要什麼。他說：『文學革命分子主張所謂中國的古文對於創造性文學作品而言，不再是一種足堪勝任（！）的工具了。他們其中一人說，哪有死語言適合用來創造活文學呢？他們拼命要證明白話或是通俗漢語（！）對於創作活的民族文學而言，必定是一種足堪勝任的活語言！』」

註 27 *Ibid.*, p. 222. 譯文為「因此讓我們檢驗一下到底這些文學革命分子所說的什麼是真實的。首先，就是文言文或古典漢語是一種死語言……爲了要證明這一點，只消指出不只所有公共文件，而且所有的公共報紙，除了極少部分外，此時此刻還全以文言文或古典漢語寫成與印刷。因此，一個人談到古典漢語時，會說出『沒有死語言適合創作活文學』的話，一定是個不知自己在說什麼的笨人，要不然就一定是個耍噱頭的大師，他知道如何利用標語的模糊意義來愚弄大眾。」

註 28 *Ibid.*, pp. 222-223. 譯文為「當今朝代的一位學者談到文學風格時，說道：『語言必須高貴，表達必須自由，文字必須簡鍊，意義必須完整。』那麼，好的古典漢語的特色就是語言高貴……現在如果任何不懂中文的讀者，能比較我的白話英文與莎士比亞的高雅語言，他將了解古典漢語與白話——胡適博士用他的留學生英語稱呼的通俗漢語——之間有何差異。如果他了解的話，他將看到文學革命運動裡十足愚蠢之處。」

註 29 *Ibid.*, p. 223. 譯文為「文學革命分子談到一種活文學，但什麼是活文學呢？愛默生說：『詩歌爲傳達精神法則而存在。』同樣的，胡適博士與文學革命分子輕視的老派中國文學家說：『文學是用來表達生命法則



的。』(文以載道)」

註 30 Ibid. 譯文為「現在，我想對胡適博士和文學革命分子說的最後的話是，在為中國引進歐洲最新的現代文學諸如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與王爾德（Oscar O. Flauberite, Wills Wilde, 1854—1900）的作品時，它們正在引進一種使人變成道德低矮的文學。事實上，一種不是表達生命法則而是死亡法則的文學——這種法則，正如羅斯金所說的，是一種永恆死亡的法則。」

註 31 Ibid., p. 223. 譯文為「的確，在看到歐洲過去五年的大規模死亡後，在觀察到這一代的中國留學生已經變成多麼的道德低矮，以致不知道而且無法感覺自己語言的高雅後——這種高雅甚至像外國人翟里斯博士也能欣賞。在看到這一切後，當我遇到仍然在說中國人需要歐洲『新學』的外國人時，於是有一些基督說的話不由自主地跑進我的頭腦裡，『你們真不幸啊，法律學家和法利賽人，你們這些偽君子！由於你們繞過千山萬水來製造一個改變信仰的人，當他被製造完成時，你們將讓他變成比你們還要加倍恐怖的地獄之子。』」

註 32 Ku Hung-ming, “Returned Stud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Literacy and Education,” pp. 435-436. 大意為：日本變成了強國，是因為在外國人來到日本時，部分日本的學生就藏身外國船隻偷渡到外國，就為了帶回能幫助他們防衛國家的東西。當他們回到了日本，不會把自己裝扮成愛國者，不會組織友誼社團或發送電報，也不會寫信給報紙去辱罵外國人或外國民族。而且，他們不會過得像外國人那樣奢華。相反地，他們依靠著微薄的薪水過活（看看過世的小村伯爵的生活，他是參加樸茨茅斯和平會議的代表），就為了要將國家治理好。他們用這種方法，贏得了外國人的尊敬。結果，治外法權終於被取消了。在兩次日本用以對抗兩個帝國的大型戰爭裡，兩個帝國的面積各自都有日本的二十五倍大。成千上萬的日本學生離開了他們的書房走向戰場，為他們的君王與國家自願奉獻生命。我說，這就是日本成為強國的原因……現在，我要問我們中國留學生為了我們國家做了什麼？最近，在北京的一處網球派對裡，我把這個問題丟給北京此地留學生精英之中的一位先生，他的英國太太正在草地上打網球。他想大聲說話，但無法回答我。不過，一位機靈的美國女士替他回答了我。「有的。」這位美國女士說，「中國留學生已經做了一些事了。」「什麼事？」我問。她回

答說：「他們有些人已經娶了非常美麗的歐洲太太。」

註 33 Ku Hung-ming,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21, p. 39. 譯文為「因此，我為何說大不列顛人民作為一個國家是一個擁有文明的國家，那是因為，除了經營商店、打贏滑鐵盧之役與統治印度帝國，大不列顛國，就像古代的希臘與羅馬，已經也製造了一個非常偉大的精神之物——也許是一個例外，在我的觀念裡，現代歐洲已經製造出的這個偉大之物——那就是威廉·莎士比亞。講到莎士比亞，卡萊爾在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裡正確地說道：『他是我們大不列顛人民已經完成的崇高之物。』如果大不列顛國明天被毀滅掉了，一千年之後，當人讀到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們將說大不列顛國是一個擁有相當高度文明的國家。」

註 34 Ibid. 譯文為「我已經說過一個國家被稱為文明國家，只有當它有一項精神資產或者是「被理解的典範」時。現在，容我請教，美國人今天有什麼「被理解的典範」或者精神資產足以展現，讓人們稱他們為一個文明的國家呢？在美國文學裡，我只認識一個大家，他就是愛默生。只是，即使愛默生，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說，在文學界並不完全是一個大家。別提荷馬、魏吉爾、但丁與莎士比亞了，甚至與柏拉圖、西塞羅、培根與伏爾泰等文學大家相較，他也不是文學大家。」

註 35 Ibid. 譯文為「再次談到詩歌，就像音樂，在一個國家之中，它是心靈生活的最高層次表達。我也知道一首由美國人寫的詩，它真的可以被稱為一首真正的詩。我所謂真正的詩，乃是全然的詩歌，而且只是詩歌而已，是一首變成一個國家的精神資產而且形成它文明的一部分，就像葛雷 (Thomas Gray, 1716–1771) 的〈鄉村教堂院落的輓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與勃恩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 的〈美好的往時〉(Auld Lang Syne)。像英國麥考萊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的詩，雖然有韻律和押韻，卻非全然的詩歌，只是修辭作品而已。現在，連有名的美國詩人像朗法羅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 與維特勒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 的詩，大部分也是修辭的作品而已，只有些許詩歌成分在其中。它們並非全然的詩歌，不像 Burns 〈美好的往時〉這種真正的詩歌，可以成為國家的精神資產。確實，我曾說過，我知道由一位美國詩人所寫，能被確實稱為一首真正的詩，而且因此能變成國家的精神資產的唯一

一首詩，就是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安娜貝兒·李〉。」

註 36 Ku Hung-ming,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 p. 39. 譯文為「同樣的，對於那些外國人，當我告訴他們大國如中國者無法成為共和國，他們會對我說，美國也是大國，卻是一個共和國。我回答他們，「美國能成為共和國，是因為美國人不像我們中國人，他們是一個沒有任何文明的民族。就像我的蘇格蘭朋友所說的，美國可能變得枯燥乏味，是因為她是一個沒有 Burns 的國家。」事實上，我可以在這裡說，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共和國，是因為可憐的、瘋狂的、低能的共和國中國佬們就像失去了辮子一般地失去了他們的文明。中國的共和政府目前所以運作不佳，乃因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文明。在我下結論之前，我要說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辱罵美國人民。我已經試著要表達的是，美國人民依然是一個沒有任何文明的民族，那是因為他們依然是一個年輕的民族。就像威廉·庇特(William Pitt, 1759—1806)在他的有名演講裡所曾經說過的，年輕並非一項『嚴重的罪過』。的確，因為美國人是一個住在像美國這樣大國家的民族，他們擁有如此偉大的潛力，使我不得不這樣想，在這次大的世界變亂後，文明如果獲得拯救的話，美國、俄羅斯與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三個未來的偉大帝國。」

註 37 Ibid., p. 27. 譯文為「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我再說一次，並不是要辱罵美國人民。我的目的在告訴人們，拯救文明的唯一方法——如果你要拯救文明，你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何謂文明。確實，我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最近閱讀了日本前首相 Hara 先生寫的一篇論文，他在文章裡面說他要融合東西文明。在我看來，當他說這件事時，如果容許我這樣說，這位日本前首相不知道什麼是文明。因為文明若非真文明，就是假文明，或者像日本人民所說的，一種虛假的文明：文明是沒有東西之分的。」

註 38 Ku Hung-m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頁 14。譯文為「但是，為什麼中國人民不需要成文憲法呢？這有兩個理由。其中一個理由相當簡單，中國人民不需要成文憲法的理由，與紳士們在中國的旅館或餐廳吃完飯後不須簽帳單的理由一樣。雖然他不曾簽署帳單，因為相同的榮譽感會使中國的紳士永遠會為吃過的晚餐如期付款；因為相同的榮譽感會使中國人民，特別是沒有任何成文憲法的中國君子，會含

蓄地服從他們曾經承認是他們君王的人。這個相同的榮譽感也使旅館或餐廳主人在沒有任何帳單的情況下，公平對待這位君子；——也促使中國的君王在沒有任何憲法的情況下，公平地對待他的人民。我認爲這就是古老的中國人民爲什麼不會擁有或不曾要求成文憲法的緣故。中國人民作爲有榮譽感的人民——一種你在中國可以看到的介於旅館或餐廳老闆與顧客之間的道德標準，在他們能履行付帳的道德義務之前，顧客不會像在歐洲和美國一樣被要求簽帳單。」

註 39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the Gentleman in China,” 頁 11。譯文爲「基督使徒詹姆士說：『純粹的宗教與在上帝與天父之前不遭蔑視，乃是在孤兒寡婦痛苦時拜訪他們，而且讓自己活在世上不受污染。』『拜訪孤兒寡婦』是社會之愛，『活在世上不受污染』是榮譽。在中國宗教裡，社會之愛的根柢，乃是孝順；榮譽的根柢乃是對君王的忠誠。」這就是君子之教的精髓。

註 40 Ku Hung-ming, “Will the Chinese Become Bolshevik?” 頁 1-2。譯文爲「換句話說，我須要指出，貪污在中國並非不誠實或不道德的產品，而是中國佬本身缺少紀律的結果。的確，有次在《字林西報》裡的一篇文章，我說：「昏頭昏腦的英國人說中國官員的貪腐是中國所有邪惡的根柢。但是讓我告訴會思考的英國人，中國所有邪惡的根柢，不是官員的貪腐，而是他們的無能。」我再說一次，中國的貪腐並非不誠實或不道德的產物，而是缺乏紀律的結果。而且這種缺乏紀律又是中國教育階層無能的產物——秩序、方法與系統的無能。精確的講，如果中國佬是像有些人所說，是如此地不誠實，我要問，爲什麼會常聽到和中國人有生意關係的外國人說：『中國人的話就像繩結一樣牢固』呢？」

註 41 同前註，頁 4。譯文爲「正如羅斯金所說的：『如果房子裡只剩下一塊麵包，媽媽和孩子們正在挨餓，他們的利益是相同的。如果媽媽吃了它，孩子就要挨餓了；如果孩子吃了它，媽媽一定要挨餓上班。但是這並不必然會跟著發生爭食麵包的情形。』但是布爾雪維克們會說，因爲媽媽在這件事裡已經表現表現得不稱職，孩子們便有權利去發動鬥爭，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殺了媽媽，以便平均分享麵包。《禮記》云：『不理會社會之愛的德行是一種不祥的、邪惡的德行。』」

註 42 Ku Hung-ming, “Will the Chinese Become Bolshevik?” 頁 4。譯文為「我為什會說中國人不會變成布爾雪維克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在中國我們有家族，很奇特地，依照一位美國教授的說法，它是中國一切邪惡的根柢。事實上，家族意識是被如此紮根在中國人民的心性之中，因此我認為任何數量的『新學』都無法摧毀它，而且只要中國的家族不被摧毀，中國人民就不會變得像鼠豬一樣，就像某些歐洲人已經變得如同羅斯金所說的失去了『上帝恩賜的人類熱情』，而且變成真正的不道德，或者如同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不仁。」

註 43 同前註，頁 5。譯文為「我說，並非歐美的個人，乃歐美的社會是不道德的，或者是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不仁，它同時是不人道的，故而它也是虛妄的。因為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尤其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是不存在社會之愛的……在古老的中國，當久旱不雨，地方官——有時是天子本人——會穿上喪服，吃齋禁葷，直到災難結束。但是在歐美，或至少是我們在中國本地的外國人社會裡所看到的，當窮人們鬧饑荒時，他們不會穿上喪服，吃齋禁葷，窮人的饑荒之災只會給富人們更多跳舞與喝香檳的機會……我不認為參加慈善舞會或去欣賞印度舞女表演的個別男女一定是不道德，而是我認為一個不但允許而且鼓勵慈善舞會以及同一類事物的社會——一個當四周的男人、女人與小孩還在挨餓時卻不知道公開跳舞、喝香檳與欣賞印度舞女舞蹈不必說乃是不道德而且也是不適當、不禮貌的行為的社會——是一個真正不道德、沒人道的社會，或者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不仁，它沒有了『上帝恩賜的人類熱情』或是社會之愛，因此，就像我所說的，一個虛妄的社會或是一個虛妄的社會秩序。」

註 44 同前註，頁 6。按：麥高文所謂「理性民主」(rational democracy) 的內容如下：「在前述對中國人民勤奮與重商生活的檢視裡，觀察到這個民族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他們的聯合能力，這種能力是文明人士的主要特點之一。對於他們而言，組織與聯合行動是容易的，因為他們世代尊敬權威與天生遵守法律。他們的順從不同於卑鄙與柔弱之人的順從，而是產生於自我控制的習慣，產生於長期處在對地方鄉鎮事務的自治狀態之中。關於國家，他們學習自力更生。如果將這個民族裡最貧窮與最沒文化的人放逐在一個島上，他們就像身處同樣生活狀態而受民主教育薰陶的人一樣，將快速地自我組織成一個政治實體。」

註 45 Ku Hung-ming, "Abolishing the Yellow Streak," p. 113. 譯文為「我想，在某個意義上，外交團的臨案照會可能有些益處。因為正如我所說的，它將使中國現在的共和主義者看到他們的錯誤，否則中國的人民將會站起來去逼迫他們去看他們的錯誤。更確切的說，中國的這個劫案真的是人民的一種抗議，以顯示真正的中國人民所要求的並非一個共和政體、北京的彩燈、高帽子與外交部舞會，而是良治……但是嘲笑共和政府與與強烈抨擊共和主義者貪腐的外國人，拒絕憐憫中國人民，當中國人民試圖終結這個共和國以及它的貪腐時，外國人現在卻正要組織一支外國警力與送給我們戰艦來終結這個劫案，這個行為（指臨案），我不斷地說，乃是中國人民擁有以抗議一個壞政府的唯一合憲的手段。」

註 46 Ibid. 譯文為「外國人對中國人民努力終結共和國政府及其貪腐的干涉，其最終結果將是如此，就像在義和團行動的時代，人民起來對抗的，不只是共和國政府與共和主義者，而且是在中國的所有外國人與外國的事物……現在我要告訴外國人，除非外國列強與外國人改變他們對於中國與中國人民的政策，一個新的義和團行動遲早必定會來到。當它真的來到時，與它相比，日本的地震將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件。」

註 47 Ku Hung-ming, "Jacobin China," p. xx. 其中有一段談到伍廷芳反叛清朝的文字。譯文為「目前這場革命暴動的最初起因，應該被記住，是列強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當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暴民利用人們對政府的特殊不滿所產生的抗議，並將它轉化成一場革命時，真正的災難就來臨了。當像伍廷芳博士這樣的人都能拍電報給中國皇帝勸告他退位時，那就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了。」按：伍氏在 1912 年 1 月 1 日民國建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總長。

註 48 這個名詞是辜鴻銘對《中庸·哀公問政》所謂「仁義」產生的效用所做的詮釋。他表示「道德感（moral sense）是人類的主要屬性，對那些與我們有至親關係的人懷有天倫之愛，是道德感的最高表達。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是對於「何者是，何者非」的認知，尊敬那些比我們優秀的人就是正義感的最高表達。對那些與我們有近親關係的人，我們應該懷有相對等級的天倫之愛（按：即『親親之殺』）；對那些比我們優秀的人，我們應該表示相對等級的尊敬（按：即『尊賢之等』）；這兩件事引發了社交生活的形式與區別。因為除非社會差異擁有一種

真實與道德的基礎，不然人民的管理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p. 32-33.

註 49 Ibid., p. 33. 譯文為「根據孔子的意見，社會差異依靠兩種道德基礎，那就是：道德感，亦即天倫之愛的最高表達——所有人類對與他們有至親關係的人懷有的愛的感情——和正義感，亦即英雄崇拜的最高表達——所有人類對那些比他們優秀的人所懷有的尊敬與臣服的感情。」

註 50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III - IV. 譯文為「我相信歐洲人民將在中國發現這個新的道德力量——在中國文明裡。這個在中國文明裡能使軍國主義變成多餘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宗教。但是人們會向我說：『在中國也曾發生戰爭。』真的，在中國曾經發生戰爭；然而，自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時代之後，我們中國人就不會擁有像我們今日在歐洲看到的軍國主義。在中國，戰爭是一種意外；然而在歐洲，戰爭已經變成一種必需品。我們中國人可能會發動戰爭，但是我們並不會不停地期待戰爭。事實上，對我而言，歐洲國家最令人難以忍耐的事，不是戰爭，而是每個人不停地害怕他的鄰居只要夠強就會前來搶奪與謀殺他。因此他必須武裝自己，或者付錢給武裝警察來保護自己。因此，讓歐洲人民苦惱的事，不是戰爭的意外，而是必須不停地武裝自己，一定要使用武力來保護自己。」

註 51 Ibid., p. I. 譯文為「所有文明起源於征服自然，亦即壓制與控制自然的可怕暴力，讓它們無法傷害人類。今日歐洲的現代文明已經成功地征服自然，我們必須承認，直到今日，還沒有任何其他文明達到這種成就。但是，在這世上有一種比自然的可怕暴力還要恐怖的力量，那就是人心之中的激情。自然的暴力所能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是無法與人類激情相提並論的。因此，直到恐怖的力量——人類激情——被適當地控制，顯而易見的，對於人類來說，文明與生命才成為可能。」

註 52 Ibid., pp. I - II. 譯文為「在社會初始野蠻的階段，人類必須使用暴力來鎮壓與抑制人類激情。因此，成群的野蠻人必須被以純粹武力來鎮壓。然而隨著文明推進，人類發現有一種力量對於鎮壓與控制人類激情，比起暴力還要強而有力。這種力量就是道德力量（moral force）。在往昔已經有效地鎮壓與控制歐洲人民的激情的這種道德力量，就是基督教。然而現在，這場被軍備所帶領的戰爭，好像顯示了基督教已經變成了一種沒有有效用的道德力量。沒有了控制與壓抑人類激情的有效道

德力量，歐洲人民不得不再度使用暴力來維持國內秩序。」

註 53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II. 譯文為「使用暴力來維持國內秩序將導致軍國主義。事實上，因為缺少有效的道德力量，軍國主義在今日的歐洲是必須的。然而軍國主義導致戰爭而戰爭意謂破壞與浪費，因此歐洲人民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如果他們拋棄了軍國主義，無政府狀態將摧毀他們的文明；但是如果他們持續軍國主義，他們的文明將因為戰爭的浪費與破壞而崩潰。」

註 54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5. 原文為：“In this essay, I have tried to show the moral causes which have brought on this war; for until the true moral causes of this war are understood and remedied, there can be no hope of finding a way out of it.” 譯文為「在這篇文章裡，我曾經嘗試指出造成這場戰爭的道德因素；因為直到這場戰爭的道德因素被理解與去除，才可能有望找到脫離戰爭的道路。」

註 55 Ibid., pp. 5-6. 譯文為「我在這篇文章之中嘗試要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因素，就是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與德國的強權崇拜。我在文章裡，把重點放在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而非德國的強權崇拜，因為如果要公平地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要為德國的強權崇拜負起責任；事實上，所有歐洲國家的暴民崇拜，特別是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炮製出現今每個人痛恨與譴責的凶暴的德國軍國主義。」

註 56 Ibid., p. 11. 譯文為「……暴民在一八四八年再度憤怒地鼓噪而起以破壞歐洲文明。於是德國民族——德國民族的骨幹，普魯士人以他們的道德品格與德國軍國主義之劍，拯救了歐洲，——拯救了王權（俾斯麥稱之為朝廷），從暴民的手中救回了歐洲文明。」

註 57 Ibid. 譯文為「但是現在，奧地利——另一個形成奧匈帝國的民族，再次妒心大生，不允許德國民族——德國民族的骨幹——普魯士來接收歐洲的道德霸權。直到一八六六年，普魯士王威廉以及俾斯麥與毛奇不得不藉由武力來鎮壓奧地利，而且將霸權接收到他們的手中。」

註 58 Ibid., p. 12. 譯文為「此後，路易·拿破崙，不像他偉大的叔父是一位領導者，而是一個暴民騙子，或者正如愛默生所說的，是一個成功的小偷，嘗試與他身後的巴黎暴民，要和德國民族爭奪歐洲的道德霸權。」



結果是威廉君王拿著手中的德國軍國主義的銳利之劍，必須行軍到色丹來鎮壓這個可憐的成功小偷與暴民騙子。信任暴民與暴民騙子的巴黎的平民男女，卻看到了他們的房子被他們信任的暴民燒殺劫掠，而不是被德國軍國主義，也不是被德國人與普魯士人燒殺劫掠。」

註 59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12. 譯文為「在一八七二年後，——不只歐洲的道德霸權，而且是歐洲的政治霸權，最後落入德國民族的手中，他們以靈魂裡的德國種族的道德性格與手中的德國軍國主義之劍，來壓制暴民與維持歐洲的和平。由於德國民族的道德性格與德國軍國主義之劍，歐洲從一八七二年以來已經享受了四十三年和平。因此辱罵與譴責德國軍國主義與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人們，應該記得歐洲究竟是如何地虧欠他們辱罵與譴責的德國軍國主義與普魯士軍國主義。」

註 60 Ibid., pp. 12-14. 譯文為「我已經在上文努力地為歐洲的德國軍國主義做了這種粗糙簡短的描述，這是為要讓德國人民了解我對他們沒有偏見，雖然我表示對於這場戰爭的責任，他們德國人民與德國民族要比別人負得更多。我認為對於這場戰爭的真正且直接的責任，德國人民與民族要負得比別人多。為什麼？因為力量意謂責任。我認為就是德國人民心中對於正直的強烈喜愛與對不正直與一切不整齊與無秩序的強烈痛恨，讓他們相信與崇拜強權。現在我在這裡想要說的是，對於不正直的痛恨、對於一切不整齊與無秩序的痛恨，當它們變得過度強烈時，當它們過度發展時，也會變成一種不正直，變成一種令人害怕與恐怖的不正直，變成某種甚至比不整齊與無秩序還要罪惡與錯誤的東西。就是對於不正直的這種強烈之恨，它來自他們對於正直的強烈之愛，對於不正直的強烈的、狹隘的、嚴厲的、死板的恨，在古希伯來人民身上被過度發展，歐洲人民要將他們的知識與對正直的愛歸功給希伯來人民。就是這種過度發展的恨，毀滅了猶太民族。耶穌基督降臨世間，就是為了將祂的子民從對於不正直的過度強烈的、狹隘的、嚴厲的、死板的恨中拯救出來。耶穌基督以馬修·阿諾德所謂他的「無法形容的甜蜜理智」(unspeakable sweet reasonableness)，告訴他自己的人民說：『熟悉我，我是溫和與謙卑的。你在你的靈魂將擁有寧靜。』但是猶太人——他自己的人民，卻不聽他的話，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結果是——猶太民族滅亡。對當時身為歐洲文明保護者的羅馬

人，基督說：『拿劍的人將死於劍下！』但羅馬人不聽其言，反而允許猶太人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結果是——羅馬帝國和歐洲的舊文明毀滅與消失。」

註 61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p. viii.

譯文為「但是對於大多數的英國讀者而言，我們不得想不到理雅各博士在他的中國典籍的譯文裡所呈現的中國人的智識與道德裝備，一定就像中國人的服裝和外表，在一個普通的英國人難以適應的眼睛裡，是一樣陌生與怪異的。」

註 62 Ibid. 譯文為「因此，在這裡的企圖就是使得這本小書成為一般英國讀者

可以接受的書。我們相信這本小書在所有以中文寫成的典籍之中，是一本給予中國人智識與道德裝備的著作。懷抱著眼前這個目標，我們試圖使孔子與他的弟子像一個有教養的英國人用相同的方式說話，如果他必須表達中國賢者必須表達的相同思想……最後，懷抱著讓讀者徹底了解所謂文本思想的意義，我們加入了著名歐洲作家的語錄作為註釋，藉由收集諸多眾所熟悉的思想，或許可以獲得熟悉這些作者的讀者的共鳴。」

註 63 Ku Hung-ming,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I,” pp.147. 譯文為「一位德國

作家說：『歐洲的文明建立在希臘、羅馬與巴勒斯坦的文明上；印度人和波斯人屬歐洲人民的亞利安血統，相互有親緣關係的。在中世紀時代，他們與阿拉伯人的來往，直到今天對歐洲文化仍有影響，還沒有完全消失。』但是，對於中國人民而言，他們文明的根源與發展卻建立在與歐洲文化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因此，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學者，要克服來自缺乏共同主要思想與觀念的全部不利條件。」

註 64 此外，我們從他對理雅各所謂「生硬文學訓練」的嚴厲批評裡，也可

可以看到他對譯文的優美與慣用的重視程度。見 Ku Hung-ming,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 p. 140. 譯文為「翻譯中國古典書籍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也是這個時代的必需品，理雅各博士已經完成了它，成果卻是一堆巨大的、沉悶的大型書本……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這項工作並不全然令我們滿意。巴爾福公正地評論道：在翻譯這些古典時，作者太過依賴自己引用的專門術語。現在我們感覺到理雅各博士引用的專門術語，是粗糙的、鄙陋的、不適當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幾乎是不合乎口語的。」

註 65 Ku Hung-ming, “A Great Sinologue,” p. 130. 原文爲：“The greatness and true efficacy of Confucius’ moral teaching, I wish to say here, lies in this very point which Dr. Giles fails to see,—the point namely that in the performance of moral duties, Confucius insisted upon the importance not of the what, but of the how.”譯文爲「我在這裡想說，孔子道德教育的偉大與成效，就在於翟里斯博士看不到的這個點上——那就是說在表現道德責任的那一點上，孔子所堅持的，不是『什麼』的重要性，而是『如何』的重要性。」

註 66 Ibid. 原文爲：“For herein l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re rules of moral conduct and the vivifying teaching of great and true religious teachers. Teachers of morality merely tell you what kind of action is moral and what kind of action is immoral. But true religious teachers do not merely inculcate the doing of the outward act, but insist up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 the inwardness of the act. True religious teachers teach that the morality or immorality of our actions does not consist in what we do, but in how we do it.”譯文爲「因爲此中存在著道德行爲的單純規則與偉大而真誠的宗教導師的生動教學之差別。道德的教師只告訴你什麼種類的行動是道德的，什麼種類的行動是不道德的。但是，真誠的宗教導師不只反覆灌輸外在行動的作爲，而且強調態度的重要性、行動的本質。真誠的宗教導師是如此教導的：我們行動的道德或不道德不在於我們做什麼，而在於我們如何做它。」

註 67 這句話出自《大學》，上下文爲：「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辜氏的英譯爲：“When he is alone, there is no evil which an immoral man will not do; but when he sees a gentleman, he immediately disguise himself and conceals what is evil and shows off what is good within him. But men see through us as through our hearts and veins lay open to them. What is the use then of concealing?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saying that what is truly within, will surely show without. Therefore a gentleman watches diligently over his secret thoughts.” Ku Hung-ming, *Higher Education*, p. 9. 譯文爲「當他獨處時，會發生不道德之人會做的罪惡；但當他看到一位紳士時，他立刻自我偽裝而且掩藏罪惡，而且誇耀他內心的良善。但別人看我們

時，就像我們的心臟和血管都暴露在他們眼前一樣。既然這樣，掩藏有什麼用呢？這就是這句話的意思——裡面真正有什麼，一定會顯露在外表。因此，一位紳士會勤勞地注意他暗地裡的念頭。」

註 68 Ku Hung-ming,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I," p. 145. 原文為："First, then: it is necessary and indispensable that the student should endeavor to arrive at a just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conduct of the Chinese.

Secondly, he will examine and see how these principles are applied and carried out in th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and family life of the people.

Thirdly, he will be able then to give his attention, and direct his study, to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y." 譯文為「首先，研究者必須努力去正確了解中國人民特有行爲的原則。其次，他要檢驗和觀察這些原則如何被應用與實現於人民複雜的社會關係與家庭生活之中。第三，他將能集中注意力與把研究方向對準國家的行政與管理制度。」讀完辜氏這段文字後，可知他認為這些「原則」影響了中國人的特有行爲、人民複雜的社會關係與家庭生活與國家的行政與管理制度。

註 69 *Ibid.*, p. 146. 原文為："This is what we mean when we say that the student of Chinese should study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conduct. In other words, we mean to say that you must get at the national ideals. If it is asked how this is to be attained: we answer, by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in which revelations of the best and highest as well as the worst side of the character of a people can be read." 譯文為「這就是當我們說漢學學者應該研究個人行爲原則時的意思，換句話說，我要說的是，你一定要了解民族理想。如果人家問我們這種境界要如何達到：我們將回答，藉由研究民族文學，其中我們可以讀到某個民族所顯現的最好與最高級以及最差勁的面向。」

註 70 Ku Hung-ming, "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p. 223. 譯文為「現在我想向胡適博士說的最後的話，文學革命正把歐洲最新的現代文學帶進中國來，諸如作家海克爾、莫泊桑與王爾德的作品，他們並非帶進活的文學；他們真正帶進來的是讓人變成道德低矮的文學；事實上，不是一種傳播生活法則而是一種傳播死亡法則的文學——正如羅斯金所說，永恆死亡的法則。」

註 71 辜鴻銘：〈東西の異同を論ず〉，《辜鴻銘論集》，頁 117-118。譯文為：在東洋，社會以道德為基礎而成長。但是在西洋，社會的基礎卻非道德，其社會乃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在東洋，人與人的關係是道德的；在西洋，則是商業買賣的關係。在東洋，名分占據了我們社會裡的重要地位。在過去封建時代之中，領主對家臣說「你們務必服從我」時，可以想見家臣會質問說：「為什麼？」這時，領主會說：「依據名分，我是你的主人。」家臣聽完時會問：「什麼樣的名分呢？」領主會回答：「大義名分。」……然而，在美國，名分則全然是金錢名分。在東洋，人與人的關係確實是神聖的道德關係。丈夫與妻子是依賴天倫而存在的關係。雙親與孩子，或者君與臣，都是天倫關係。然而，在美國，人與人的關係是商業買賣主義，人與人之間依賴金錢聯繫。東洋的社會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這兩個基礎就是「親親尊賢」——親情（affection）與英雄崇拜（hero-worship）。我們因為愛雙親，所以服從雙親。再者，我們服從比我們偉大的人，因為他的人格與智慧與道德值得我們尊敬。學者和車夫比較，前者比後者值得尊敬的理由，乃是因為學者以腦力工作而過度勞苦，過度吃力。車夫只有使用身體，所以折磨稀少，因此他所受到的尊敬便稀少……假如車夫乘車而學者拉車，當權威顛倒擴張的社會已然出現時，這種社會將可以存在嗎？……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就像前文所述，我們服從雙親，是因為我們愛雙親；我們服從賢者，是因為我們尊敬賢者，這就是東洋社會的基礎。

註 72 辜氏英譯《大學首章》的原文，也是作如是觀。其譯文如下：“After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ings and only the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will come. Whe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have come, and only then, will men have true ideas. When men have true idea, and only then, will their minds be in a proper and well ordered condition. When men’s minds are in a proper and well ordered condition, and only then, will their conversation be ordered aright. When men’s conversations are ordered aright, and only then, will their house be kept in order. When men’s houses are kept in order, and only then, will there be good government in the country. When there is good government in all countries, and only then, will there be peace and order throughout the world.” Ku Hung-ming, *Higher Education*, p. 7. 譯文

爲「在系統研究事物之後，而且只有那時，知識與理解將會來到。當知識與理解已經來到時，而且只有那時，人們將會擁有真實的意念。當人們擁有真實意念時，而且只有那時，他們的心思將會處在一種適當與秩序井然的狀態。當人們的心思處在一種適當與秩序井然的狀態時，而且只有那時，他們才會走上正路；當人們都走上正路，而且只有那時，他們的家庭將會被維持地井然有序；當人們的家庭維持地井然有序時，而且只有那時，國家之中將會出現良治。當所有的國家之中都出現良治時，而且只有那時，全世界才會擁有和平與秩序。」

註 73 按：《中庸·哀公問政篇》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辜鴻銘對此段文字有以下的詮釋：「道德感（moral sense）是人類的主要屬性，對那些與我們有至親關係的人懷有天倫之愛（親情），是道德感的最高表達。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是對於『何者是，何者非』的認知，尊敬那些比我們優秀的人就是正義感的最高表達。對那些與我們有近親關係的人，我們應該懷有相對等級的天倫之愛（親情）（按：即『親親之殺』）；對那些比我們優秀的人，我們應該表達相對等級的尊敬（按：即『尊賢之等』）；這兩件事造成了社交生活的形式與區別。因爲除非社會差異擁有一種真實與道德的基礎，不然人民的管理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根據孔子的意見，社會差異依靠兩種道德基礎，那就是，道德感，天倫之愛（親情）的最高表達——所有人類對與他們有至親關係的人懷有的愛的感情——和正義感，英雄崇拜的最高表達——所有人類對那些比他們優秀的人所懷有的尊敬與臣服的感情。在家族裡，天倫之愛（親情）使得臣服（submission）變得容易；在國家裡，英雄崇拜使得主從關係（subordination）變得自然與適當。」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p. 33-34.從他對「仁」與「義」的不同功用的認知與詮釋，便可知道他認爲「仁」的目標在齊家，「義」的目標則在治國、平天下。

註 74 見 Ku Hung-ming, preface to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p. ix-xii. 譯文爲「言歸正傳，我在《末日札記》裡想說的話，就是這個。今日世界的真正無政府狀態並不在中國——雖然中國人正在遭受它的後果——而是在歐洲與美國。無政府狀態的徵象與檢驗標準，並非在一個國家裡是否發生或多或少的無秩序或錯誤管理的情形。真正的檢驗標準是

這樣的，“Anarchy”這個字在希臘文裡的字面意義是『無王狀態』。無政府狀態有三個階段或程度。第一個階段，是在一個國家裡沒有真正的有能力的國王；第二個階段，是國家的人民公開地或默默地不相信國王的統治。第三個與最壞的階段來到時，是國家的人民不只不相信國王的統治，甚至也不相信君王威嚴——事實上，變得完全不能辨識君王威嚴或人心之中的人性價值。在我看來，歐洲與美洲正在快速接近無政府狀態的最後與最壞的階段……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即使是現在的事物狀態也不能被描寫成無政府狀態或無王狀態。在上個月兩宮奔離京城之時，整個政府機制被北京的劇變所搖撼，中國人民卻忠誠地服從他們法定的當局，表現良好到世上其他人民無法做到的程度。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國的無秩序與混亂，只是一種功能的錯亂(a functional derangement)；然而，歐美的無政府狀態卻真正是一種器官的失調(an organic disorder)。」

註 75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p. 185-186. 譯文為「源自基督教聖經的舊文化的語言是象徵的，是一種圖象的、象徵的與隱喻的語言。現代道德文化的語言是具體的語言：科學的語言。前一種語言說道：『對他而言，使他走上正道(修身有成)，將顯示出上帝的拯救。』另一種語言則說：『想要國治的人，一定要從齊家開始；想要齊家的人，一要從適當地關注個人的行為開始』」按：國治始於齊家，齊家始於個人的良好行為，明顯來自《大學》「修、齊、治、平」的觀點。人類所以能關注自己行為，因為他們早具有「人性的智慧力量」，不須依靠上帝的拯救。這種說法又明顯受到《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論述所影響。

註 76 辜鴻銘：〈中國古典の真精神〉，《辜鴻銘論集》，頁 77-82。譯文為「我曾經在我的論文『中國問題』裡表達過，中國文化的目的、中國教育的精神乃在創造新社會。歐美的許多人經常認為，中國學問裡缺少所謂「進步」的概念。然而我寧可站在他們的反對面，相信表現在中國古代經典的學問裡的中國文化真精神，是「秩序與進步」。『四書』裡所謂的『中庸』，我將它譯為“Universal Order”（普遍的秩序）。在『中庸』裡，以下有句相類似的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歐美之人之前陷入與今日陷入的根本錯誤，在於特別無視道德秩序而渴望獲得進步。如同建築巴比倫塔的古巴比倫人，他們將摩天樓式的文明越發地往高處建築，無視自然法則

的存在，忘記了自然法則的存在。其結果，正如吾人所看到的，他們的摩天樓式文明現今不是正在崩壞嗎？在中國古代經典裡，所謂『進步』這個明確而適切的概念是儼然存著的，如果拿《大學》來看，就能獲得證明。……在近代歐洲，進步乃指產業的發達與機械工業的發達。然而，在中國古代經典裡，進步卻是指人的進步、人的靈魂的進步、人的理性的進步。在『大學』裡，不斷創新、創造更優良的社會，乃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也就是所謂的「新民」。這個文句的註釋者，引用了紀元前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左右的天子成湯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盤文，其目的大概是讓人難以忘記吧！再者，註釋者又引用了文王所說的「作新民」來加以連結。如此一來，放言中國古代經典裡沒有進步概念的人應該不會有了吧！……至於中國古代經典裡沒有進步概念，是在歐美四處可見的心胸狹窄的傢伙所說的話而已，他們把摩天樓式文明誤認為唯一最高的文明。因此，他們應該不會了解『進步發達』的真正意義吧！」

註 77 Ku Hung-ming,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 pp. 137-138. 譯文為「在法國，雷慕沙是在歐洲各大學中擁有漢文教授職位的第一人。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不能贊一辭。但是，他的一本著作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一本翻譯小說《雙堂妹》。這本著作被雷洪讀過，然後把它推薦給卡萊爾，卡萊爾再把它推薦給約翰·史特林。約翰·史特林愉快地閱讀這本書，而且說這本書必定是一位天才之人所寫的，而且是一個『模仿龍紋的天才之人』所寫的。這本小說中文名稱為《玉嬌梨》，雖然是一本讀起來十足愉悅的書，但對於同類型的小說而言，它的列名並不高。儘管如此，令人愉悅的是，想到從某個中國佬腦子裡出來的思想與想像，竟然已經通過了諸如卡萊爾與雷洪這些人的心靈。」

註 78 Ibid., p. 142. 原文為：“But with one or two exceptions, he has not been quite fortunate in the choice of subjects worthy of his pen. One exception is the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hich may be taken as a model of what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should be. But the Liao-chai-chih-i, a remarkably beautiful literary work of art though it be, belongs yet not to the highest specime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譯文為「除了一兩個例外，他在選擇值得他下筆的對象時並不是很幸運。其中一個例外就是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這本書可以被認為應該是中文外譯的典範，但是《聊齋志異》雖然是一本非常美麗的文學藝術之作，卻不在



中國文學裡的最高等級的典範著作群之中。」

註 79 Ku Hung-ming,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I,” p. 149. 原文為：“But we can now explain this by the fact that, besides the trashy novels we have already noticed, the work of translation among students of Chinese was formerly confined exclusively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譯文為「但我們現在能藉由這個事實來解釋這種情況，即除了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垃圾小說外，漢學家的翻譯著作從前都特別侷限在儒家經典的範圍。」

註 80 Ibid. 原文為：“Just fancy, if a foreigner were to judge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works of Miss Rhoda Broughton, or that class of novels which form the reading stock of school-boys and nursery-maids! It was this cla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Sir Thomas Wade must have had in his mind, when in his wrath he reproached the Chinese with ‘tenuity of intellect.’”譯文為「試想，如果一個外國人竟然會從 Miss Rhoda Broughton 的著作，或從學童與保姆閱讀的那個層級的小說，來判斷英國文學！就是這種層級的中國文學讓威妥瑪裝進他的心靈裡。當他憤怒時，就用『智力貧乏』來責備中國人。」

註 81 Ibid., pp. 149-150. 譯文為「有另一個曾經加諸在中國文學上的特別評價，就是指它極度地過分道德。因此中國人民確實被指控為過分道德。然而就在此同時，多數的外國人卻相當同意中國人是一個騙子民族！但是我們能用以下這個事實來為這件事解釋，那就是：除了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垃圾小說外，研究漢文的學者的翻譯著作以前完全局限於儒家的經典。竟管如此，在這些文字裡，除了道德之外，還存在許多其他的事物，而且出於對巴爾福先生的敬意，我們想這些書籍所包含的『絕妙學說』斷然不是『功利的和世俗的』，就像它們先前被他所認定的那樣。我們只想提出兩個句子而且請問巴爾福先生他真的會思考它們是『功利的和世俗的』嗎？『得罪上天的人』孔子回答一位大臣說道，『得罪上天的人，他沒有地方可以求助與禱告。』又，孟子說：『我愛生命，但我也愛正義；但如果我無法擁有二者，我會拋棄生命而選擇正義。』我想偏離主題如此之遠以便反駁巴爾福先生的判斷，這是值得的。因為我們想到，像『被古代所束縛的奴隸』、『詭辯的專家』這種厲害的措辭是不應該被運用在有意於哲學的著作裡的，更何況把它們放在中國最受尊敬的名人身上。巴爾福先生被南華先知所誤導，

他熱切地強調道家之徒勝過正統學派，他已經被引入誤用措辭的歧途裡，我們肯定，這些措辭一定會被他自己較為平靜時的判斷所譴責的。」

註 82 Ku Hung-ming, “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I,” p. 152. 譯文為「正如我們已經表示的，已經如此了解人民的主要原則與觀念後，那麼學者將能夠把他的研究指向人民的社會關係，來看看這些原則是如何被應用與實行的。然而人民的社會制度、風俗與習慣不會像香菇一樣，一夕之間長成，乃是經由漫長的幾個世紀發展才能形成現在的樣子。因此，有必要去研究人民的歷史。」

註 83 Ibid. 譯文為「包爾格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國歷史》或許是把像中國人這種有文化的民族寫得最差勁的歷史。像包爾格先生寫的這種歷史，如果是寫的是像霍鈍樸這種野蠻民族，是可以被容忍的。這種中國的歷史已經被出版的事實，只可以表示歐洲人對於中國人的知識是多麼不完美……衛三畏博士的著作諸如《中國總論》以及其他討論中國的其他著作，由於缺少這類知識，不只對學者的意圖無用，也誤導了廣大的眾多讀者。」

註 84 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 33. 原文為：  
“For unless social inequalities have a true and moral basi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is an impossibility.” 譯文為「除非社會差異擁有某種真實與道德的基礎，否則人民的良治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按：辜氏認為“social inequalities”（社會差異）是好的東西，不過需要擁有真實的和道德的基礎，而這個基礎就是構成「禮」的「親親之仁」與「尊賢之義」。它們產生的「親親之殺」與「尊賢之等」讓中國社會成了一種「社會差異」的現象，不過卻構成了一種尊卑井然的人倫秩序，安定了中國社會，讓中國人成了最守秩序的族群。

註 85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 iv. 譯文為「我在本論文的正文裡寫道：『我們中國學者在面對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時，就像英國的中產階級面對法國革命的思想與學說一樣，感到徬徨無助。』我又寫道：『為了有效處理現代歐洲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學者需要擴展。』現在我認為擴展的意思是，為數浩繁的理論以及行為與紀律的規則，被人類在以後的時代刪減成所謂基督教或儒教的系統，並非絕對的真正的宗教，就像在中國或歐洲的文明一樣，並非絕對的完美的文明。」

- 註 86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p. viii-xv. 譯文為「倫敦《泰晤士報》說：『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對完美的一偏之見 (little vision)。』再者，每個稱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的英國人，都認為他自己對完美的一偏之見如果不會比任何人好，也與他們一樣的好，而且他根本不在乎我們所謂的正確理性與上帝的意志……在我看來，事實上，現代的英國人甚至比起我們老式的中國學者，還更需要擴展，一種以靈魂擴展為真實意義的擴展。真正的擴展教導這件事：有這麼一個東西，諸如善良的心與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正確理性，足以決定孰是孰非與孰優孰劣。」
- 註 87 Ibid., p. xv. 譯文為「真正擴展的真實價值，在於它能使我們看到我們自己對完美的一偏之見，就像倫敦的《泰晤士報》所稱呼它的，確實離開內在於事物永恆本質之中的真正的、絕對的完美很遙遠。」
- 註 88 Ibid., p. xvi. 譯文為「然而，重大的困難出在如何獲得這個真正的擴展。在我看來，爲了要獲得真正的擴展，用一句在政界時髦的慣用語來講，『門戶開放』(open door) 政策是個必要的東西，不是對貿易與鐵路開放門戶，而是智識與道德的『門戶開放』。的確，若沒有智識與道德的開放門戶，真正的擴展是不可能的。『門戶開放』原則在聖保羅的那些話裡已經被表明了，『檢驗所有的事情；堅持好事。』……我已經提供了聖保羅對『門戶開放』的定義，我現在將提供孔子對『擴展』的定義。孔子說：『在真正有教養的人們之中，是沒有種族的區別的。』」
- 註 89 Ku Hung-ming, "John Smith in China," pp. 115-116. 譯文為「在讀過前述句子後，在中國的某位英國人，當他要一張白紙時，如果他聽從克勞塞先生道理不通的勸告，將對他的男僕說：「孩子，給我一張黑紙。」我想，在中國的外國人裡面講求實務的人士，爲了他們的信譽，就能夠拋棄這些有關東方精神真正本質的胡言亂語，當他前來實際地與中國人打交道。事實上，我相信那些和中國人相處得很好而且成爲在中國此地最成功的外國人，乃是堅持  $2+2=4$ ，而將東方本質的  $a+b=c$  理論與盎格魯撒克森理想留給約翰·史密斯和克勞塞先生。」
- 註 90 Ibid., p. 117. 譯文為「介於東方與西方之間的  $a+b=c$  恆等式的解答，是一個非常複雜與困難的問題。因爲其中有許多未知的量，不只有

諸如孔子的東方與康有為先生與端方總督的東方，也有莎士比亞與歌德的西方與約翰史密斯的西方。」

註 91 Ku Hung-ming, “Defensio Populi Ad Populos,”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4, 1891, p. 118. 譯文為「當然，他們這種使用反科學的戲法來鼓吹科學的虛偽，是不值得縱容的。如果我認為在中國的傳福音工作是失敗的，我必須說傳教士最近對以科學與科學器械來使中國強大的高談闊論（無疑帶有反抗他們自己國家的最終目的），如果不是一種極其明顯的詐欺，就是一種妄想。」

註 92 Ibid. 譯文為「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是一種智識活動，這種說法一點也不是事實，任何人若努力去研究以中國教會刊物名義發表的這一大塊難以窺測的黑暗迷團，就能輕易地讓自己相信，實際上，就是這一大塊黑暗迷團讓有教養的中國人在智識上輕視外國人；而且當有教養的中國人看到了這一大塊黑暗迷團，一方面伴隨著傳教士們妄自尊大與極具侵略性的自負態度，另一方面又藉由外國政府的炮艦威脅，被塞給了人民，這使得他憎恨外國人。這種憎恨只有某些人才感受得到，因為他們看到了屬於自己也屬於族群與國家的至高至聖之物，看到了他們的見解、文化與文學教養正處於無法挽回的毀壞的危險之中。讓我再說一次，這就是讓有教養的中國人憎恨外國人的根源。」

註 93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84. 譯文為「歐洲中古世紀道德教養的源頭是基督教的《聖經》。被歌德看成是一本世界文學，就像荷馬的《伊里亞德》與魏吉爾的《伊尼亞德》一樣，《聖經》是一本非常偉大的典籍，而且永遠不會完全消失。正如馬修·阿諾德所指出的，《舊約》的道德宏圖、耶穌基督人格的優越性與他在《新約》裡直接與簡單的教義——全部這些東西，對所謂歐洲培養出來的最佳典型的人類產生的影響已經達到了入骨的程度。再者，它對歌德所謂世界文學能影響的人來說，將一直產生永恆的力量與價值。」

註 94 Ibid. 譯文為「但對普通的人來說，並非如此。因為歐洲的普通人，為了充分感受到《聖經》的力量，他們必須擁有與創作《聖經》的人一樣的心智狀態。但我想，現在眾人都承認，杜克勞斯所說的『理性胚芽』已經大大改變了歐洲普通人的心智狀態了。對於這些人來說，基督教的《聖經》變得難以理解，如果不是完全讀不懂，其結

果也肯定是無法將它當成真正道德教養的源頭了。已故的赫胥黎教授有一次在倫敦的學校董事會上說，如果英倫三島完全沒有了宗教，他也不會想到藉由《聖經》的力量來引介宗教的觀念。」

註 95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p. 187-188. 譯文為「歐洲人民多半已經失去了他們對中世紀道德文化的力量與約束力的感覺，而且已經不能充分地獲得現代道德文化，來用它作為一種約束力量以維持國內秩序。他們現在完全不用任何道德力量，而是憑藉警察或所謂軍國主義的純粹武力，來維持國內秩序。卡萊爾說：『現代歐洲的狀態是無政府狀態加上一位街上保安官。』某位法國作家說得更好：『武力正在等待公理。』」

註 96 Ku Hung-ming, "John Smith in China," p. 159. 譯文為「在我看來，在所有歐洲國家裡，確實最怪的事，是每個真正負責政府事務管理的人——統治者、士兵以及外交家或政治家與部長，都不准有任何自己的意志，不准有任何權力去做他認為對國家安全與利益最好的事，而是每個男女平民，——約翰·史密斯，他是《愛國雜誌》的編輯；豪茲迪奇的巴布斯，他在卡萊爾時代曾幹過香腸製造商和果醬生產商，現在是建造大無畏級戰艦船廠的擁有人；還有摩西斯·南普，他是放款人——被賦予充分的權力在政府裡貫徹他們的意志與擁有全部的發言權；事實上，就是被賦予權力去告訴真正的統治者、士兵和外交官要為國家的利益與安全做什麼。因此，如果你對這件事深入觀察，你將發現就是這三個人——約翰·史密斯、豪茲迪奇的巴布斯和摩西斯·南普，他們要為這次戰爭負責任。我要在這指出，就是因為這三個人，約翰·史密斯、豪茲迪奇的巴布斯和摩西斯·南普，他們製造了可怕的現代機器，——歐洲的現代軍國主義，而且就是這個可怕的機器帶來了這次戰爭。」由這段文章看來，辜鴻銘所指的「奢華集團」，係平民、媒體與財團三種人組成的竊盜政府權柄的集團。

註 97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90. 原文為："Militarism is necessary in Europe but not in China. The foreign gunboat policy has done and will only do harm to the interests of all concerned, foreigners as well as Chinese." 譯文為「軍國主義在歐洲是必要的，但在中國卻不是必要的。外國的炮艦政策已經而且將只會傷害所有相關人的利

益，包括外國人與中國人的利益。」

註 98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p. 191-192. 原文為："The only possible way, therefore, for the people of Europe to escape for the ruin resulting from the burden of their Militarism, is to struggle for the attainment of what we have called the new moral culture, which now lies 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Liberalism." 譯文為「因此，讓歐洲人民逃離軍國主義負擔所造成的毀滅，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努力去獲得我們所稱的新道德文化（the new moral culture），它現在隱身於自由主義這個泛稱之下。」

註 99 Ibid., pp. 182-183. 譯文為「任何認真研究過歐洲現代制度的人不可能不察覺到，過去一百年來，在歐洲有種相當不同於中世紀文化與社會秩序的意識正在以泛稱為自由主義的名義滋長著，它是新社會秩序裡代表新道德文化與概念的一種意識。在上世紀末，就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之前，一個叫杜克拉斯的人說：『在法國，有一種理性胚芽正在開始成長。』的確，人們現在普遍地認識到，目前所謂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概念首度被上世紀的法國哲學作家適當地了解與推廣……就我們所知道的，『理性胚芽』最後發展成自由思想，在上世紀造成了中世紀制度的全面崩潰。」

註 100 Ibid., p. 192. 譯文為「歐洲人民將花多少時間來獲得這個東西？這不可能說得出來。真的，在我看來，歐洲的自由主義在本世紀末已經退化了。卑康斯菲爾德勳爵談到他的時代的英國自由主義，說他很驚訝它（他的時代的英國自由主義）已經變成了一種寡頭政治。在我看來，今天歐洲的自由主義，也已經變成了一種寡頭政治：『奢華集團』（pampered unit）的一種寡頭政治。」

註 101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93. 譯文為「『對第一代的編年史家而言，以及對他們筆下的第一代十字軍而言，回教徒只是他們痛恨與輕視的目標；顯然，那些如此談論他們的人並不認識他們。較為晚期的十字軍的歷史便被說得相當不同；明顯的，他們不再看待他們為怪獸；他們已經某種程度地進入他們的思想；他們已經與他們同住，他們之間已經建立起關係與甚至是一種同情（sympathy）。』因此，這兩種人，基佐接著說，而且特別是從偏見裡解放出來的十字軍，那些偏見乃是無知的產物。他最後說道：『這

一步便以此方式往人類精神解放的方向跨邁而去。』」

註 102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186. 譯文為「現代道德文化的效果，將是麥高文博士說到中國人民的特徵時所說的『有關國家，人民的責任在依靠自己。』……以自由主義為名的現代道德文化的結果，將是麥高文博士所說的『理性民主』，也就是依賴自由體制的統治。」

註 103 按辜鴻銘在“Civilization and Anarchy”一文末引了三首洋詩來表達這種期待。不過其中以愛爾蘭詩人 Robert Burns 以下這首詩，最能當作代表。“Then Let us pray that come it may, As come it will for a’ that, That sense and worth o’er a’ the earth, May bear the gree and a’ that: For a’ that, and a’ that, It’s coming yet for a’ that, That man to man the wild warl’ o’er, Shall brithers be for a’ that.” *ibid.*, p. 197. 譯文為「那麼，讓我們祈禱它來到，它將為那一切而來到，那遍布大地的理智和價值，可以產生歡樂與所有一切：為了所有那一切，以及所有那一切，它仍將為那一切而到來，在這寬闊大地上，為了那一切，人與人之間應該成為兄弟。」

註 104 Ku Hung-ming, “The Manchu Restoration,” p. 77. 譯文為「簡單來說，唯一能賴以建立更好的事物秩序與新中國的基石，就是中國的滿族貴族。但是，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滿族貴族——我們中國的上議院，一定要改革。事實上，在中國的我們與在英國的人民，在我們能夠全然做任何事之前，現今迫切需要的首要事物，就是改革的貴族。」

註 105 Ku Hung-ming, “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Civil Service in China Part 1,” p. 472. 由於原文太長，茲濃縮辜氏之意如下：中國遠古時期，就像歐洲一樣，出現過封建政府，部分家族或部族的領袖成為中國最早期的統治者。此時，統治階級的基礎是出身 (birth)，亦即貴族的義務 (noblesse oblige)。以後，貴族地位沒落了，中國進入了一個擴展與重建的時期。此時民主主義以及現今被稱為歐洲的自由思想 (Democracy, with what are now called liberal ideas in Europe) 在中國興起了，要求「門戶開放」(open door) ——要求打掉讓依靠出身的特權統治階級與平民百姓對立的障礙，這種情形發生在兩千多年前。接著，這種純粹的民主主義被秦始皇純粹的軍國主義 (pure

militarism) 給終結了。純粹的軍國主義，俾斯麥首相把它定義為「鐵和血」(iron and blood)，儘管強大，卻不穩定。因此，秦朝很快就被推翻了，布衣天子劉邦建立了另一個朝代——漢朝。劉邦原本傾向用軍國主義治理天下，最後聽人勸告，便將他的軍事獨裁政府修正成海涅所謂「一種以施行現代自由思想為目的之獨裁政府」(a dictatorship for carrying out the liberal ideas of modern times)——或許它可以被定義為合憲的獨裁政府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或與純粹軍國主義不同的帝國主義 (帝制) (Imperialism as distinguished from pure Militarism)。在早期封建時代裡，統治階級的基礎是出身，在純粹軍國主義之中，統治階級的基礎是武力，訴求的對象幾乎沒有。但在我們稱為合憲獨裁政府或帝國主義，訴求的對象乃是民族的理性，而這乃藉由創造一個以教育為基礎而非出身或財產為基礎的統治階級所完成。事實上，中國政府的穩定乃依賴它擁有最優秀的有教養的人作為它的支持者。君王擁有專制的權力，但是他的專制權力乃被有教養的統治階級所支持，而且要對他們負責。當然君王有時會肆無忌憚地運作他的專制權力，而無視於有教養的統治階級的意見。然而在這種情形下，在政體之中有一個特殊部門會用道德力量來勸他不要這麼做。當然君王也會持續忽視這一個道德力量，但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將有失去權力與王位的危險。當中國的君王堅持違反統治階級的意見，統治階級將會使用唯一合憲的方法來加以報復並終止他的錯誤統治。不過，只有當中國的統治階級變成腐敗與無用時，受苦受難的平民才會鼓噪而起而成為一股難以統治的民主潮流 (ungovernable democracy)。那麼，政府將回復到純粹軍國主義的原始形式——強權等待公理。至高無上的權力將落到能夠行使它的人的手裡，然後就會發生改朝換代的事情。雖然中國的平民對國家事實上的政府沒有決定權，但有關朝代更迭的最後決定權卻掌握在他們手裡。孟子說：「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總而言之，中國君王的權力基礎，歸根結底，真的就是軍事權力，就是軍事獨裁者的權力，中國的政府真乃軍事政府。但是，當君王的至高無上的軍事權力一旦建立完成時，純粹的軍國主義就會被修正為海涅所謂以施行現代自由思想為目的之獨裁政府：一個依賴有教養的統治階級來訴



諸民族理性的獨裁政府；一言以蔽之，就是帝國主義〔帝制〕或合憲的獨裁政府。中國政府因此應該被定義為帝國主義（帝制）。

註 106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 x.

譯文為「在以下的翻譯裡，將會發現有關道德義務感的說明與闡釋。道德義務感形成了中國文明系統裡人類社會之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秩序的基礎。其中當然沒有『新學』（new learning），而是有著更好的真實的學問（true learning）在裡面。只要是曾經有過文明的國家，在它們的最好文學作品裡，都能發現與道德義務感有關的各式各樣的說明。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如我在附加於正文翻譯後的註釋裡所顯示的，在現代歐洲最優秀與最偉大的思想家的作品裡，也可以找到和這部寫在兩千年以前的典籍所使用的同樣形式與同樣語言的表達，好像它就是這部典籍裡的一部分。」我們從《英譯中庸》裡許多辜氏的註釋之中，就可以發現他使用了這種類似「格義」的西學詮中方法。

註 107 例如《中庸》第六章，孔子稱讚舜的「隱惡而揚善」，辜氏英譯為 “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 and he recogniz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a positive existence.” 譯文為「他看待邪惡為只是某種反面的事物而已，而他認為只有好事才擁有正面的存在價值。」因此，他在註釋裡，便搬出了莎士比亞與歌德，寫道：“Now, if seen through the intellect of Shakespeare, a human monster of wickedness becomes merely a man with strong ill-regulated passions; the very Devil seen through the great intellect of the great Goethe, becomes not a monster of fire and brimstone, not even an evil spirit, but merely a spirit of negation (ein Geist der vermeint), in fact, merely a partial, incompletely developed nature. Goethe elsewhere says: ‘What we call evil in human nature is merely a defective or incomplete development, a deformity or malformation—absence or excess of some moral quality rather than anything positively evil.’ We can see now how deep and true is the insight of Confucius in pointing out in the text above that the true characteristic of a great intellect is ability to see only good and not evil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p. 8-9. 譯文為「如果看過了

莎士比亞的名作，他筆下邪惡的人類怪物，都只是一種具有強烈而控制不良的激情的人類而已。看過了偉大的歌德的鉅著，十足的惡魔成了並非火與硫磺的怪物，甚至不是一個邪惡的靈魂，而只是一個反面的靈魂，事實上只是一個發展不完全的天性而已。歌德在別的地方說道：『所謂人類天性的邪惡，只是一種不完全的發展，一種畸形——某種道德品質的不及或過度，而非任何明確的邪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眼光是多麼地深與真，他在上文指出了偉大才華的特質，就是有能力去看到萬物的天性裡只有善良而無邪惡。」按：「隱惡而揚善」明明是針對「好察邇言」的「邇言」而來的，正如朱注所云：「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見（宋）朱熹：《四書集註》，中庸，頁 4-5。與辜氏所要宣揚的性善性惡說，毫無關係。

註 108 Ku Hung-ming, "Moriatur pro Rege, Regina," pp. 20-21. 譯文為「現在，如果我在上文已經成功地以任何方法來表示與傳達了中國人民對慈禧太后的感情，外國人應該可以了解十三四歲的年輕中國男孩為什麼能夠以「愚蠢、著魔的魯莽」的姿態衝向現代歐洲的槍口。每當歐洲現代執著於科學的人（scientific men）偶然遇到他們不能解釋的人類精神的特殊表現，他們就稱它為狂熱（fanaticism）。但什麼是狂熱呢？它是這樣的。能驅使人類去做有勇氣與英雄氣概的特殊舉動而且讓他們自我犧牲的唯一動力，就是一種被某種渴望所鼓舞的動力，這種渴望就是去保護某種他們打從心底景仰、熱愛與尊敬的東西，當讚美、熱愛與尊敬變成無限與超越時，勇氣與英雄氣概也變成了無限與超越——這就是狂熱。」

註 109 Ibid., 譯文為「現在，什麼是中國人民作為個人與作為民族所熱愛、尊崇與尊敬的標的物呢？在私人的生活裡，中國人民熱愛、尊崇與尊敬他們的父母，他們的感情被兒時與家的全部記憶所纏繞與神聖化。作為民族，中國人民現在熱愛、尊崇與尊敬皇上陛下，他藉由慈禧太后的意志與任命而成為帝國王朝財富的繼承者。帝國王朝已經恩慈地統治中華民族長達兩百五十年之久，中國人民內心的感情是多麼地深厚啊！義和團男孩的狂熱已經坦率地加以證明了——狂熱，正如我所說的，就是勇氣的無限與超越的動力，它驅使人們

去保護他們內心之中無限地與超越地熱愛、尊崇與尊敬的東西。」

註 110 Ku Hung-ming, “Moriatur pro Rege, Regina,” pp. 20-21. 原文為：

“But I will support this ‘politique du coeur’—to adapt the beautiful French expression ‘la politesse du coeur,’—by hard, commonsense practical reasons.” 譯文為「但是我將藉由不容懷疑而具有常識性的實用理性支持這個『情感的策略』——改編自法文短句『情感的殷勤』。」

註 111 這是因為他受到英國傳教士麥嘉溫稱讚中國人的說法：「由於生來崇尚權威和恪守法紀的天性，組織與聯合行動是件容易的事情……倘若這些人中最貧窮可憐、最不文明的部分將他們自己置身於一個孤島之上，他們也會像在原來地區生活、受過理性民主熏陶的人們那樣，很快便將自己組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同時，他也受到了英國迪金遜教授說法所影響，表示：「中國人是民主政治的人種，他們對於他們自己與同伴的對待態度與關心範圍，乃歐美民主主義者所企盼歐美人所變成的人。」辜鴻銘：〈デモクラシイとは何ぞや〉，《辜鴻銘文集》，頁 151-152。

註 112 Ku Hung-m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II,” 頁 39。譯文為「藉由促使君王的專制權力向國家裡最有教養者的清議負責。因此，正如我所說的，某種真正民主政府的開端是首先建立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

註 113 Ku Hung-ming,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 pp. 57-58. 譯文為「治外法權是一種反常之物——它在道德效度上，已經傷害了中國的良好事業。然而列強的代理人不思減少它的罪惡，反而允許引進一種更為惡劣的反常之物，那就是治內法權。不滿足於中國的帝國政府對外國人沒有司法權，列強卻又允許他們的代理人去否定中國政府對中國臣民的司法權。」

註 114 Ku Hung-ming, conclusion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102. 譯文為「總之，因為我們認為某個制度是錯的，我們才去抵制它；抵制它而不理會抵制的結果，就是一種不道德的暴行。一種不道德的舉動決不能改革作何制度，即使這個制度真的是一種邪惡與不道德的制度。」

註 115 Ku Hung-ming, “The Middle Class Ascendancy,” p.17. 譯文為「但是中國的文人，成長於宋代狹隘的儒家清教徒主義的影響之下，不知擴展為何物。有鑑於現代歐洲文明的到來，他們對於擴展之道的概念，是中國必須擁有現代化的槍隻與戰艦。」

註 116 Ku Hung-ming, “Mr. Ku Hung-ming on the situation,” *North China Herald*, Oct. 28, 1911, p. 239. 譯文為「再者，我為什麼認為目前的革命將是一場失敗的革命，是因為這場革命的核心人物是一群在革命中永遠會失敗的人。這場革命的核心人物屬於眾所認知的革命黨，外國人稱之為“Revolutionary Party”。然而在歐洲，革命黨被稱為雅各賓黨。」

註 117 Ku Hung-ming, “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No.1.],” p. 92. 譯文為「兩千年前，中國一位沙皇（Czar）藉由活埋四百個儒生——所謂文人——他們是那個時代中國不良刊物（yellow press）的編輯，將和平賜給了當時的中國。」按：依照辜氏之意，這些儒生乃由戰國時代縱橫家的流裔，他們是演說「愛國主義」的教師階級、教授與宣傳家，與身為發狂愛國主義者的雅各賓主義者非常相似。見 Ku Hung-m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II,” 頁 36。

註 118 Ku Hung-ming, “The Manchu Restoration,” p. 52. 譯文為「最後，像英國的萊斯頓勳爵與中國的鐵良這種人，他們沒貢獻出天生的智識（native intelligence）或常識（common sense），也沒貢獻出學問（learning）或理智的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只貢獻出英雄主義（heroism）與高貴的品格（nobility of character）——這種人住在混亂的時代，藉由變成白癡來將自己從瘋狂裡救出來。他們變成了瞎眼的獨眼巨人，有力量卻沒眼睛——一點理智也沒。不過像萊斯頓勳爵與滿族鐵良這種身為道德獨眼巨人的人，——才是一種「真正的」力量，因此它是一種道德的力量。」

註 119 Ibid. 譯文為「所有真正的力量是建設性的，因為所有真正的力量永遠尋求去建立秩序，即使當它在破壞，也是為了要建設——所有真實的力量都只是為了要建設而破壞——建設就是建立秩序。」

註 120 Ibid., p. 53. 譯文為「一位孔子的弟子請他來定義一種真正的道德生活。孔子回答：「一種真正的道德生活在於克己，而且藉由禮的判斷力——何者為適當的判斷力，來指導那個克己的本質。」因此，端方及其中國義和團徒眾們和英國爭取婦女參政權的女子的狂熱或高

貴的瘋狂——是真實的力量，但不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為端方及其義和團徒眾們和英國爭取婦女參政權的女子不能充分地自我克制。」

註 121 Ku Hung-ming, “The Manchu Restoration,” p.58. 譯文為「孔子說：『如果我不能找到真正穩健與思想清醒的人相處，迫不得已，我將找狂熱者與頑固者。狂熱者會做些事與追求進步，然而有某些事，頑固者是不會去做的。』」（原文為：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有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

註 122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p. x-xi. 譯文為「我在本論文的正文裡寫道：『我們中國文人在面對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時，就像英國的中產階級面對法國革命的思想與學說一樣，感到徬徨無助。』我又寫道：『為了有效處理現代歐洲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人需要擴展。』」

註 123 Ibid., p. xvi. 譯文為「總之，不只中國，而且今天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進步』與『改革』，而是『擴展』，然而不是政治與物質意義上的『擴展』，而是理智與道德意義上的『擴展』。沒有了理智的『開放門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擴展』，而且沒有了真正的精神『擴展』，就不可能有進步。我已經給公布了聖保羅對『開放門戶』的定義。我現在將公布孔子對『擴展』的定義。孔子說：『在所有真正有教養的人們之中，是沒有種族的差異的。』」

註 124 Ibid., p. x. 譯文為「現在我認為擴展的意思是，為數浩繁的理論以及行為與紀律的規則，日後被人類歸併成所謂基督教或儒教的系統，並非絕對的真正的宗教，就像在中國或歐洲的文明一樣，並非絕對的完美的文明。」既然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都不是絕對的完美的文明，那麼必定有一種超越在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之上的完美文明。

註 125 Ku Hung-ming, “The Manchu Restoration,” p.45. 譯文為「但是生活在革命與擴展的時代裡，——諸如現今住在中國和歐洲的人們——當文化與文化相遇與碰撞時，舊的社會秩序和模式和國家的生活習慣很容易就像地震裡的陶器破碎支離，——在這種時代，人們立刻會面對新事實，他們必須正確地詮釋它們，否則新事實就像埃及的獅身人面獸一樣，將吞噬他們、他們的社會制度與他們的文化。」

註 126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20. 譯文為「爲了壓制強權崇拜，爲了壓制德國，普魯士或世上任何軍國主義，我們必須做的唯一事，就是去思考歌德所說的另一個字——得體（*Schicklichkeit*）。而且，在思考這個字的時候，要表現得體，簡言之，亦即行爲適當……這就是良民宗教的本質，這就是中國文明的奧祕。這也是歐洲新文明的奧祕，乃由德國的歌德教導給歐洲人民。而且，這個文明的奧祕乃是不用強權而用公理與得體來壓制強權，事實上乃是不用強權而用修身與表現適當來壓制強權以及世上邪惡的東西。修身與表現適當，意謂做對的事與表現得當。」此外，同頁亦有辜氏對於“to do right and to behave with tact and good taste”的註解，文字與《中國的牛津運動》的〈結論〉一模一樣。即：“Confucius says, ‘The moral man, the gentleman by living a life of simple truth and earnestness can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註 127 Ku Hung-ming, “Mr. Ku Hung-ming on the situation,” p. 239. 原文爲：“There is, however, one safeguard against the disaffection of the literati and that in Confucianism—the religion of loyalty in Confucianism.” 譯文爲「無論如何，對於士大夫的不忠，中國人有一種防護措施，那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裡的忠誠宗教。」

註 128 Ku Hung-ming, “The Middle Class Ascendancy,” p. 28. 譯文爲「然而現代歐洲的新學教導的是，一個人的成功與一個國家的強大的基礎在於擁有財富、權力和物質繁榮。依據李提摩太牧師的看法，他是中國新學的熱心倡導者，表示『沒有商業價值的教育是絕對沒用的。』」據此，辜鴻銘所謂的新學乃指以西方物質文明爲內容的學說，在他的眼中，新學正是源自他所謂的現代歐洲物質文明的摧毀力量。

註 129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X. 譯文爲「良民宗教教導正義的法律意謂真實、忠實、忠誠；每個國家的婦人要對她的丈夫絕對忠誠，每個國家的男人一定要無私，要對他的統治者、國王與君主絕對忠誠。事實上，我想說良民宗教的最高責任是忠誠的責任，忠誠不只在於行爲，而在於精神。正如丁尼生所說的，尊敬國王好像他是他們的良心，尊敬良心好像它是他們的國王，打倒異教徒，擁護基督。」良民宗教除了教導忠誠外，

還包括孝順父母，即《論語》所謂「入則孝，出則弟。」故它是忠誠宗教的擴展成果。

註 130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II. 譯文為「過去壓抑與控制歐洲人的激情而有效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現在這個軍備優於一切的戰爭，似乎顯示出基督教已經成爲一種無效的道德力量了。沒有了有效的道德力量來控制與壓抑的人類激情，歐洲的人民已經使用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使用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導致了軍國主義。」

註 131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p. 165. 譯文為「現在，我說，對我而言，唯一能而且將撲滅暴民崇拜，撲滅此刻威脅要毀滅今日世界上所有文明的暴民崇拜宗教的，就是這個忠誠宗教，就像我們中國人民在良民宗教裡所擁有的神聖教義與忠誠大憲章。這個忠誠大憲章將讓所有國家盡責任的統治者、士兵和外交官免受暴民的騷擾，而且讓他不只能夠維持國內的民間秩序，而且也能夠維持世界的和平。再者，藉由促使所有優良與真誠的人都能夠幫助他們合法的統治者去讓暴民知所敬畏而且壓制他們，這個忠誠大憲章，這個擁有忠誠大憲章的良民宗教，將使所有國家的統治者能夠維持自己國家與世界的和平與秩序，而不用皮鞭、警察、士兵，一言以蔽之，就是不用軍國主義。」

註 132 Ku Hung-ming, preface to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p. x. 原文爲：“The word Anarchy is Greek literally means ‘Kinglessness.’” 譯文爲「Anarchy 這個字在希臘文裡的字義是『無王』(kinglessness)。」按：Anarchy 乃由暴民崇拜而來，良民宗教既然能去除暴民的滋擾，自然能讓國家遠離「無王」的亂象。

註 133 Ku Hung-m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II,” 頁 39。譯文爲「因此我們短暫掃描一下中國歷史，真正『使世界因爲民主而感覺不安』的，不是『軍國主義者』，而是教授和官僚！教授是受了錯誤教育的人，而官僚是半受教育的人。因此，對教授和官僚的治療是——真正的教育。但在真正的教育出現之前，首先一定要有真正的良治，在真正的良治出現之前，一定要先有『王權』(Kingship)。」按：良民宗教即忠誠宗教，首重人民對君王的絕對忠誠，因此「王權」必定得到確保，而良治的實施自然不在話下。

註 134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X.

譯文為「事實上，我真的相信，歐洲人民在這次戰爭後，將會在中國這裡發現文明難題的解答。我在這裡再說一次，在中國這裡有一種無法估價而至今為止不受懷疑的文明資產，而且這個文明資產就是真正的中國人（the real Chinaman）。真正的中國人是一種文明資產，因為他擁有一種歐洲人民在大戰後需要的新文明的祕方〔the secret of a new civilization〕，那個新文明的祕方就是我所謂的良民宗教。」

註 135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81. 譯文為「這些人的

身上被觀察到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聯結的能力，這是文明人類的主要特徵之一。對他們而言，組織與聯結是容易的，因為他們懷有與生俱來對權威的尊敬與遵守法律的天性。」

註 136 Ku Hung-ming, preface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6. 譯文

為「我認為就是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要為德國的強權崇拜負責的理由，乃是因為道德品格——德國民族內心對不正直、混亂與失序的極端痛恨，讓他們痛恨暴民，痛恨暴民崇拜與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者。」

註 137 Ku Hung-m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II,” 頁 33。譯文為「然

而，目前在一個國家裡，為什麼要有政府呢？換句話說，什麼是政府的起源（origin）與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人類社會之前，一個家庭，或一個國家能夠存在，一定首先會出現一種道德標準，而這種道德標準就是所謂的文明。因此，政府存在的理由與真正功能並非保護人身與財產，不是保護『豬和豬槽』（pigs and pigs' troughs），而是要保護這個被稱為文明的道德標準。」由於辜氏認為政府與國家的起源是文明，因此他在《中國牛津運動》一書裡，曾表示在中國牛津運動失敗後，「我或許是在我們成員之中唯一一個還絕對相信我們的事業會獲得最後勝利——中國文明的事業對抗現代歐洲的進步與新學。」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 3. 他所以如此推崇文明，乃因文明在他的心目中居於崇高的地位，為拯救天下的良藥。我們從他對「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的英譯，就可看到他的內心真作如是觀：“The moral man by living a life of simple truth



and earnestness alone, can help to bring peace and order, help the cause of true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譯文為「有道德的人藉由過著一種平凡真誠與認真的生活，就能幫助帶來和平與秩序，能幫助世界真正文明的事業。」此外，他也把《大學》首章裡的「明明德於天下」，翻譯為“to further the cause of enlightenment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因此，他才會主張英國與美國若要拯救自己面臨破產的文明，就不能摧毀中國的文明，最後還要依賴這個文明產生的中國良民宗教來拯救他們。

註 138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II.

譯文為「在過去有效來壓制與控制與鎮壓人類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現在這場被軍備所引導的戰爭，似乎顯示了基督教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效的道德力量。沒有了控制與壓制人類激情的道德力量，歐洲人民已經再度利用武力來維持國內秩序。」

註 139 Ibid., p. V – VI. 譯文為「今日歐洲文明的基本缺點，依我看來，在於它對人性的錯誤觀點；它認為『人性為惡』(human nature is evil)

的觀點與因為這個錯誤觀點，使得歐洲的整個社會結構變成須要經常依賴武力了。歐洲人民要依靠兩件事來維持國內秩序，那就是宗教與法律。換句話說，歐洲人民要藉由對上帝與對法律的恐懼才能被統治得井然有序。恐懼意味武力的使用。因此，爲了要維持對上帝的恐懼，歐洲人民首先必須養一大堆昂貴而無所事事的教士……在除掉利用對上帝的恐懼來統治人民的教士後，歐洲人民又必須養另一批更昂貴而無所事事的警察和士兵。」此外，他在同一篇文章裡又寫道：「使用武力來維持國內秩序，將導致軍國主義。事實上，因爲缺少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軍國主義在今日的歐洲是必要的。但是軍國主義將導致戰爭而戰爭意謂毀滅和浪費。因此，歐洲人民現在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如果他們廢止軍國主義，無政府狀態將摧毀他們的文明；如果他們維持軍國主義的話，他們的文明將因爲戰爭的浪費與破壞而崩潰。」 Ibid., p. II.

註 140 Ibid., p. III. 譯文為「由於有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軍國主義將變得沒必要而且將自己消失。不過現在，基督教已經變成一個無效的道德力量。問題出在歐洲人民在那裡可以找到新的有效道德力量來讓軍國主義變得沒必要呢？我相信歐洲人民將在中國找到這個新的道

德力量，——在中國文明裡。中國文明裡能使軍國主義變得沒必要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宗教。」再者，就「健全理智」的「理智」而言，辜氏認為不如中國人講的「仁」的層次高。他表示：「羅斯金談到邪惡時，說道：『所有邪惡的本質在於缺乏感覺。手的遲鈍與心靈麻木讓人們變得邪惡。他們的邪惡永遠與以下情況成正比：無法交感

(sympathy)——無法快速理解(quick understanding)，如果強烈堅持使用普通卻極其正確的術語的話——無法行使所有一切可以被稱為身體與心靈的『觸覺功能』(“tact” or “touch” faculty of body and soul)：(這稱功能)樹上的含羞草有之，純粹的女人也勝過其他生物而有之，它是超越理性的優雅與感覺的豐沛。理智只能決定什麼是真的：——它是神賜給人類的熱情，只有它能辨識上帝創造的善。』因此，仁字的適當定義，用羅斯金的話來說，就是『神賜給人類的激情』(the God-given passion of humanity)。」 Ku Hung-ming, “Will the Chinese Become Bolshevik?” 頁 2。由此觀之，馬修·阿諾德的「健全理智」，在辜氏眼中，乃感官知覺的層次，不如「仁」字已然進入心靈的範疇。

註 141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V.

譯文為「然而人將對我說你如何讓人類承認公理與正義是一種比武力還高級的力量，我答道你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讓人類相信公理與正義的效力，讓他們相信公理與正義是一種力量，事實上，是一種善良的力量。他們又問我你將如何做呢？好，——為了要做這件事，中國的良民宗教在每個小孩能夠了解文字的意義時，就教導他『性本善』。」按：辜氏註解“the Nature of man is good”云：「中國的每個小孩上學時，第一本放在他手中的書本裡的第一句話。」(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first book that is put into the hands of every child in China when he goes to school.) 這本書就是《三字經》。

註 142 Ibid. 譯文為「在我看來，今日歐洲文明的基本不健全在於它對於人性的錯誤觀念；它抱持人性是惡的觀念，而且因為這個錯誤觀念，歐洲社會的整體結構總要依賴武力(才能穩定)。被歐洲人民依賴以維持國內秩序的兩個東西，就是宗教與法律。換言之，要依賴對上帝與法律的恐懼，才能讓歐洲人民守秩序。」

註 143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91. 譯文為「軍國主義在歐洲是必要的，因為人民不滿足。軍國主義是文明的捍衛武士或保衛者——武力等待公理。在丁尼生的中世紀語言裡，它的功能就是『打倒異教徒，捍衛基督。』亦即壓制粗暴、野蠻與無政府狀態。但是歐洲的軍國主義最近正被用來對抗無政府狀態與粗暴，反而對抗真正的文明，對抗中國人民的良治。因此，歐洲的軍國主義被誤用得越多，它的費用負擔將增加得越多。」

註 144 Ibid., pp. 191-192. 譯文為「因此，對歐洲人民而言，逃離軍國主義負擔所造成的破壞，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為（被）我們稱為新道德文化的成就而奮鬥，這個新道德文化隱身於自由主義這個通名之下。」

註 145 Ibid., p. 192. 譯文為「的確，在我看來，歐洲的自由主義在本世紀末已經退化了……上世紀的自由主義有文化，然而今日的自由主義已經喪失了它的文化。過去的自由主義讀書而且了解理想，現代的自由主義只讀報紙而且為了它的私利而利用偉大的自由格言。過去世紀的自由主義為公理與正義而戰，今天的自由主義只為權利與貿易特權而戰。過去的自由主義為人道而戰，今天的虛假主義只試著促進資本家與財政家的利益。」

註 146 Ibid., p. 194. 譯文為「現代的被稱為殖民政策的歐洲十字軍，最終將完成歐美人類精神的解放。人類精神的完全解放最終將製造一種普遍而真誠的寬容文明（Catholic civilization），這是一種立基於某種道德文化的文明，這種文明並非奠基在只乞靈於人心之中的希望與恐懼之激情的道德文化之上，而是建立在訴諸人類的冷靜理智的道德文化之上。」

註 147 Ibid., p. 195. 譯文為「在生活行為的所有內容之中，他讓某種規則成為他唯一遵守的規則，這種規則並非來自外界的權威，而是來自內心的理智與良心。他生活可以沒有統治者，卻不能沒有法則。因此，中國人稱一個有教養的紳士為君子。」

註 148 Ku Hung-ming, appendix D to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 93. 譯文為「過著富有、空閒、奢華的階級告訴勞動階級，他們所說的話被政治經濟學者所擁護，說道：『我們很抱歉，但我們能說什麼呢？你們沒有看到，除非我們喝香檳和生活奢華，不然貿易就要受損了；當貿易受損時，受到傷害的不就是勞動階級你們嗎？』就是

這個邏輯與藉口讓特權階級支持社會差異。」依照這段話的意思，就是特權階級爲了壓榨勞動階級以攫取利益，因此支持社會差異，才能將勞動階級踩在腳下。

註 149 Ku Hung-ming, appendix D to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p. 93-94. 譯文爲「然而與此相對，社會主義者公正地回答道：『如果你們說的都對，然而就事物的本質言，有沒有任何理由不讓我們互換角色呢？爲什麼輪不到你們這些懶惰的特權階級去工作，爲什麼輪不到我們這些工作階級拿你們的獲利，去喝香檳，去過奢侈的生活？』『但是你們不能那樣做。』特權階級回答道：『因爲你們沒有錢。』『我們有武力，能夠拿你們的錢。』『哦，你們不能那樣做，因爲神聖的財產權。』社會主義者問道：『但，是誰授予神聖的財產權呢？』特權階級回答道：『法庭與法學家。』『但，如果我們不服從法庭與法學家的決定呢？』『那麼』特權階級回答道：『警察會把你們抓到監去，就是這樣。』因此，現代歐洲的社會基礎就是法學家和警察——武力與欺騙；它不是一種道德的基礎。」此外，他在別的地方也有類似的論述：「它的觀念是人類的本性是邪惡的，因爲這個錯誤的觀念，歐洲社會的整個結構所依賴以維持國內秩序的兩個東西，就是宗教與法律。」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VI.

註 150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p. 159. 譯文爲「約翰·史密斯，《愛國時報》的編輯；芬斯第奇的包伯斯，卡萊爾時代的香腸製造商與果醬製造商；莫西斯·藍普，一個放款商人——被授予充沛的權力在政府裡實現他們的意志與暢所欲言；事實上，是擁有權力來告訴實際的統治者，他們要爲國家的福利與安全做什麼。因此，你將會發現，如果你觀察得夠深入的話，就是這三個人——約翰·史密斯、芬斯第奇的包伯斯和莫西斯·藍普，要爲這次戰爭負責。」按：這三個人除了芬斯第奇的包伯斯，曾經出現在卡萊爾的筆下外（見《過去與現在》第四冊第八章），餘二人皆爲辜氏所虛構。辜氏舉出這三人的名字，目的只在說明民主政治裡商人對政治掌控的實際情況。

註 151 *Ibid.*, p.161. 譯文爲「因此，如果你對這件事追根究柢的話，你將了解，並非統治者、士兵與外交官，甚至不是約翰·史密斯、芬斯第

奇的包伯斯和莫西斯·藍普，而實在是善良的誠實的平民男女，諸如迪金生教授要為這場戰爭負責任。然而迪金生教授卻加以譴責說道：『我們平民男女不要這場戰爭。』然而當時，誰要這場戰爭呢？我回答道：『沒有人要這場戰爭。』那麼，何物造成這場戰爭呢？我回答道，就是恐慌（panic）造成這場戰爭；暴民的恐慌——當去年八月，平民男女幫助建造的巨大機器開始移動時，這種驚恐抓住與占領了全歐洲國家的平民男女。簡而言之，就是恐慌，我認為——暴民的恐慌，成群結隊的平民男女的驚恐自我傳播、抓住與麻痺了目前交戰各國統治者、士兵和外交官的頭腦，而且讓他們感到無助。就是這種狀況造成了這場恐怖的戰爭。」

註 152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p. 164. 原文為："The reason why the rulers, soldiers and diplomats of the countries now at war cannot see this, is because they feel themselves helpless; helpless before the panic of the mob,-the panic of the crowd of plain men and women; in fact, as I said because the panic of the crowd, the panic of the mob has seized and paralysed their brains." 譯文為「交戰各國的統治者為什麼看不到這一切，乃因他們自己感到無助，在面對暴民的恐慌感到無助；事實上，就像我所說的，乃因群眾的恐慌，暴民的恐慌支配與麻痺了他們的頭腦。」

註 153 Ibid., p. 167-168. 原文為："To prove the efficacy of what I now propose, let me here call the attention of the people of Europe and America to the fact that it was the absolute loyalty of the people of Japan and Russia to their rulers which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Ex-president Roosevelt to make a successful appeal to the lat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present Emperor of Russia to stop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o command and order the peace to be made at Portsmouth." 譯文為「為了證明我現在提出的功效，讓我在這裡請歐美人民注意到這個事實：就是日本和俄國人民對他們統治者的絕對忠誠，使得羅斯福總統，能夠成功地呼籲已故的日本天皇與俄國的現任君王來停止日俄戰爭，與贏得在樸次茅斯創造的和平。」

註 154 Ibid., p. 170. 譯文為「如果你深入探究，這次戰爭的真正根源乃是樸次茅斯條約。我認為樸次茅斯條約是這次戰爭的根源，是因為在

這次條約後，俄國的皮鞭——皮鞭的力量已然斷裂，已經沒有東西可以保護俄國君王遠離平民男女，遠離成群結隊的平民男女的恐慌，事實上是遠離俄國暴民的恐慌，暴民對於俄羅斯帝國與斯拉夫民族的完整與安全（不保）的恐慌！……事實上，我再說一次，在樸次茅斯條約後，獨裁統治，——皮鞭，俄國的皮鞭力量已然斷裂，已經沒有東西可以保護統治者遠離暴民了。我說，這就是戰爭的真正根源。換言之，這次戰爭的根源與原因就是對俄國暴民的恐懼。」

註 155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p. 172. 原文為：“I have said that the real origin and cause of this war was the fear of the mob in Russia. Now I want to say here that, real first origin and cause of this war was not the fear of the mob in Russia. The first origin and cause,-the *fons et origo* not only of this war, but of all the anarchy, horror and misery in the world today,-is the worship of the mob, the worship of the mob now in all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 America,-especially in Great Britain. It was the worship of the mob in Great Britain which caused and brought on the Russo-Japanese war.” 譯文為「我已經說這次戰爭的真正根源與原因就是對於俄國暴民的恐懼。現在我要在這裡說，這次戰爭的真正最初根源與原因並非對於俄國暴民的恐懼。這次戰爭的最初根源與原因，不只是這次戰爭，也是今天世界裡所有無政府狀態、恐怖與悲慘的最初根源，乃是『暴民崇拜』，所有歐洲國家與美洲，特別是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就是大不列顛的『暴民崇拜』造成了日俄戰爭。」

註 156 Ibid., p.172. 原文為：“The panic of the mob in Great Britain,-especially the selfish panic of the British mob in Shanghai and in China whose mouth piece then was the ‘great’ Dr. Morrison the ‘Times’ correspondent in Peking, with their shout for the ‘open door’ in Manchuria alarmed and incited the Japanese in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按：這是辜鴻銘對大英帝國的暴民崇拜引發日俄戰爭的註解。譯文為「大不列顛的暴民的恐慌——特別是上海與中國的大不列顛暴民的自私恐慌，他們的喉舌就是《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偉大』的莫里遜博士，他們對滿洲『門戶開放政策』的叫嚷，提醒與催促了日本人投入日俄戰爭。」

註 157 〈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孔安國傳云：「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又云：「拂，戾也。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卷4，頁53上。按：二句譯文應為「不要違背道來向百姓求取名譽，不要違逆百姓來成就自己的欲望。」然而，辜氏的英譯為 “Do not go against what is right, to get the praise of the people. Do not trample upon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to follow your own desires.”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p. 174. 譯文為「不要違背正道來獲取人民的稱譽，不要蹂躪人民的願望來順從你自己的欲望。」顯然，辜氏的中文引文與英譯與原文以及原義均有差異。

註 158 Ku Hung-ming,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pp. 175. 譯文為「對於忠誠大憲章而言，國家裡負責的大臣與政治家將不會對暴民負責，不會對匹夫匹婦負責，而是對他們的國君與他們的良心負責。這樣將會保護他們，使他們遠離誘惑，做出違背正道而獲得人民稱譽的事——事實上是保護他們遠離暴民崇拜。」由於忠誠大憲章要求臣民對君王的絕對忠誠，因此臣子所要負責的對象是君王，而人民只是他代君王管理的對象，並非他要負責的對象。以下一段文字，可為明證：「我要說的是，改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就是當每個總督與巡撫與所有被委任公職的高級官員能夠提著頭向慈禧太后與皇上負責保證，不只是為了保護外國人，更不是為了獲得外國政府的支持，而是為了良治，亦即，是為了每個在他們治下的官員的品格、行為與能力，而且是為了託付在他們身上的與人民攸關的福祉與良治。」 Ku Hung-ming,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 pp. 69-71.

註 159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 194. 譯文為「在新文明之下，對於有教養的人而言，自由並非意謂為所欲為的自由，而是意謂做正確之事的自由。農奴或沒教養的人不做錯事，乃因他害怕現世的皮鞭或警察的警棍與來世的地獄之火。但對於新文明的自由人而言，皮鞭或警察或地獄之火都不再是需要之物。他做正確的事乃因他喜歡做正確的事，他不做錯事，並非由於某種動機或難堪的

或怯懦的恐懼，而是因為他討厭做錯事。」這個新文明乃歐美文明受到中國文明影響而產生的一種新文明，實際就是辜鴻銘一再標榜的中國良民宗教或忠誠大憲章。

註 160 Ku Hung-ming, “The Peace of Cathay,” *The Living Age* 316, (1923. 6): 9. 譯文為「因此我們看到了呈現在歐洲人民前面的巨大而直接的問題，如果他們想要拯救和保護文明，方法就是去發現權威原則，那是建立政府系統的道德基礎。現在歐洲人民將要去那裡發現這個東西呢？我答道：『他們將只會在中國發現這個東西——在中國文明的宗教裡發現這個東西。』建立歐洲文明的宗教是基督教，正如我在別的地方所說的，基督教是一種教導人成為好人的宗教。但中國文明的宗教——儒教，是一種不只教人如何成為好人也教人如何成為好公民的宗教。換句話說，基督教是一種私人的或個人的宗教。正如偉大的義大利學者所說的，『依據基督教，生命裡崇高的目標是個人的道德與宗教的完美。』相反的，儒教——中國文明的宗教，乃是一種政治的與社會的，事實上是一種國家的宗教。」

註 161 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26. 譯文為「在寬廣與普遍的意義下，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儒教已經成為了一個宗教，因為它的教化已經被認定為正確而且它的行為規範被整個中華民族所遵守。然而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赫伯·史賓塞的哲學甚至沒有變成了這種寬廣與普遍意義下的宗教。我認為儒教與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與赫伯·史賓塞的哲學——後者繼續成為一種為有學問的人而設的哲學，然而前者已經變成了一種宗教或是為中國人民大眾與中國有學問的人而設的一種宗教對等體（the equivalent of a religion）。」

註 162 Ibid., p. 29. 原文為：“The great service, I say, which Confucius has don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at he gave them a true idea of a State, Confucius made that idea a religion. In Europe politics is a science, but in Chin, since Confucius’ time, politics is a religion. In short, the greatest service which Confucius has don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 say, is that he gave them a Social or State religion.” 譯文為「我認為孔子對中華民族所做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國家的正確觀念給了他們。在給予國家正確觀念的同時，孔子讓這個觀念變成了宗教。在歐洲，政治是一門科學，然



而在中國，從孔子的時代開始，政治就是宗教。總而言之，孔子對中華民族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社會或國家的宗教。」

註 163 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31-32. 原文為：“When I was in Japan last year the ex-Minister of Education, Baron Kikuchi, asked me to translated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taken from the book in which, as I said, Confucius taught this State religion of his. The four character(s) were Ming fen ta yi. (名分大義) I translated them as the Great Principle of Honor and Duty.” 譯文為「當我去年在日本時，前文部大臣菊池男爵請我翻譯這本書裡的四個字，正如我所說的，孔子在其中宣揚他的國家宗教。這四個字是名分大義。我把它們翻譯為榮譽與責任的大原則。」

註 164 辜氏在這裡所謂的「祕密」之說，來自《中庸》所謂「君子之道費而隱」（第十二章）的說法。他的英譯為“The Law of the Gentleman is to be found everywhere, and yet it is a secret.” *ibid.*, p.50. 其實，這個「隱」字應解釋為「精微」，不過他為了與歌德的「公開祕密」說相配合，就將「隱」字英譯為“secret”。至於歌德的「公開祕密」說，應是辜氏得自於卡萊爾的〈作為詩人的英雄 但丁；莎士比亞〉一文。文章說道：「在我們現代的不精確的觀念中，『詩人』和『先知』是南轅北轍的。但在某些古老的語言中，這兩個名稱是同義的；Vates 既指『先知』，也指『詩人』：當然在所有時代裡，如正確理解它，在意義上是相近似的。基本上，他們仍是同樣的東西；尤其是在這最重要的一方面而言：他們兩者都曾洞察這個『宇宙』的神聖祕密；即歌德所謂的『公開祕密』。『哪一個是偉大的祕密？』一個人問。——『公開的祕密』，——對所有的人都是公開的，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看到它！在遍存於所有『存在（Being）』中的那個祕密，斐希特稱為『這個世界的神聖思想，藏於一切外象的底層』；所有外象，從星光閃閃的天空到地上的青草，尤其是『人』和他的工作的『外象』，都是這神聖思想的『外衣』，是使它能被看得見的具體形式。這個神聖的神祕在所有時代和所有地方都存在，的的確確存在。但在大多數的時代和地方它卻被忽略了……」卡萊爾著，何欣譯：《英雄與英雄崇拜》，頁 103。據此，歌德的「公開的祕密」即斐希特的

「神聖思想」(the Divine idea of the Universe)，而依據以下一段辜氏的文字：「擁有偉大知識的人已經為宇宙的神聖秩序取了不同的名字，德國哲學家斐希特稱之為宇宙的神聖思想。用中國哲學語言來說，它稱為『道』——道路。然而無論擁有偉大智慧的人可能為宇宙神聖秩序取任何名字，就是這個宇宙神聖秩序的知識，讓擁有偉大智識的人看到了遵守道德行為或道德律的絕對需要。道德行為或道德律形成了宇宙神聖秩序的一部分。」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49. 「神聖思想」就是「道」，「道」即「道德律」，而「道德律」即「費而隱」(無所不在而祕密)的「君子之道」。因此，辜氏便斷定歌德的「公開的祕密」即「君子之道」。

註 165 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 60. 原文為：

“The law of gentleman begins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but in its utmost reaches, it reigns and rules supreme over heaven and earth—the whole universe.”譯文為「君子之道開始於夫婦的認知，然而就它可及的最大範圍來說，它高高在上地統治著天空與大地。」

註 166 Ibid., p. 59. 原文為：“But if the life of religion is the law or the gentleman, the soul of religion,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is love.”譯文為「然而如果宗教的生命是君子之道，則宗教的靈魂，神啓的來源，——是愛。」

註 167 Ibid., pp. 50-51. 原文為：“People imagine that religion enables and makes men obey the rules of moral conduct by teaching men the belief in God. But that, as I have shown you, is a great mistake. The one and sole authority which makes men really obey moral laws or rules of moral conduct is the moral sense, the law of the gentleman in them. Confucius said: ‘A moral law which is outside of man is not a moral law.’”譯文為「人們想像宗教藉由向人們宣揚上帝信仰，使人能夠遵守道德行為規範，正如我已經向你們所顯示的，那是一個大錯誤。使人們遵守道德法則或道德行為規範的唯一權威與來源，是道德感，在他們心中的君子法則。孔子說：『在人心之外的道德法則不是道德法則。』(可離非道也。)」

註 168 「我們現在談談最後一種英雄的形式；我們稱之為『帝王』者。『人類』的『統帥』；我們的意志要服從他的意志，忠實地屈服於他的意志，他可以被認定是『偉人』中之最重要者。實際上他是把所有『英雄氣質』的各種形態集於一身；教士，教師，我們能想像到任

何人世的和精神的『尊嚴』集於一身，具體地表現出來，以『統率』我們，供給我們實際的教訓，告訴我們每一天和每一小時該『做甚麼』。他被叫做 Rex 支配著 (Regulator) Roi：我們自己給他的名字是較好的 King, Könning，意思是 Can-ning，『能幹的人』。」卡萊爾著，何欣譯，《英雄與英雄崇拜》（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臺灣中華書局印行，1963年），頁261。按：卡萊爾這種「英雄崇拜論」被辜鴻銘用來支撐他的尊王思想。他稱人民崇拜英雄的感情為「義」，又稱為「正義感」；另一種感情則為「仁」，又稱為「道德感」，則是人民愛親人的感情。「仁」屬於「家庭宗教」的範疇，「義」屬於「國家宗教」的範疇。他將《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一段文字翻譯為 “The moral sense is the characteristic attribute of man. To feel natural affection for those nearly related to us is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the moral sense. The sense of justice is the recognition of what is right and proper. To honor those who are worthier than ourselves is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the sense of justice. The relative degree of natural affection we ought to feel for those who are nearly related to us and the relative grades of honor we ought to show to those worthier than ourselves: these are that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forms and distinctions in social life.” 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p. 32-33. 譯文為「道德感是人類的特有屬性。對與我們的近親所懷有的天倫之愛，就是道德感的最高表達。正義感則是對於何為正確與適當的認知，去尊敬賢者，是正義感的最高表達。我們對於敬親應該懷有的成比例的天倫之愛，以及我們對於賢者應該懷有的成比例的尊敬，形成了社交生活裡的禮儀與區分。」他在譯文後面，則有以下一段註解：「在這裡，根據孔子的說法，社會差異依賴兩個道德基礎，亦即，道德感，它的最高表達是天倫之愛——全人類對於近親所懷有的愛的感情——以及正義感，它的最高表達是英雄崇拜——全人類對於賢者所懷有的尊敬與服從的感情。在家庭之中，天倫之愛使服從變得容易；而在國家裡，英雄崇拜使主從的關係變得自然與恰當。」 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A Confucian Catechism*, pp. 33-34.

註 169 Ku Hung-ming,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p. 2. 原文爲：

“Confucius remarked, ‘A young man, when at home, should be a good son; when out in the world, a good citizen.’” 譯文爲「一個年輕人，當在家時，應該成爲一個好兒子；當出門在外時，應該成爲一個好公民。」原文爲「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論語·學而》）

註 170 Ku Hung-ming, “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Civil Service in China part 1,” p. 472. 譯文爲「我在這裡將指出的是，中國辦理科舉考試不像歐洲人民的選舉權，它毋寧是一種功能，一種重要的功能，讓中國政府得以執行開放門戶的政策——對所有人開放在政府服務裡的職業。」

註 171 Ku Hung-m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p.

3. 原文爲：“The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was also directed against Liberalism, against the modern European ideas of progress and new learning.” 譯文爲「中國的牛津運動也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進步與新學的現代歐洲思想。」

註 172 Ku Hung-ming, “Civilization and Anarchy,” pp. 194. 原文爲：“……

deriving its sanction not from any power or authority outside, but as Mencius put it, from the innate love in man’s nature for mercy, for justice, for order, for truth and for truthfulness.”即，前述「健全理性」的道德文化，辜氏稱之其來源「非來自外在的力量或權威，而是正如孟子所說的，來自於人性之中的天生之愛，這種愛追求仁慈、正義、真理與忠誠。」

註 173 辜鴻銘：〈中國文明の復興と日本〉，《辜鴻銘論集》，頁 11-12。譯文爲

「爲何只有日本反抗西方各國的侵略，阻止此種侵略而且是亞洲唯一如此做而成功的國民。世人都認爲這是不可思議的事。那本《北京之塵》的作者——美國婦人愛蓮·拉·摩托女士的記事之中，寫道：『日本是在東亞國民之中，唯一沒被歐洲人踐踏的國民。』我曾經這樣說過，答案就是『日本人是崇高的國民。』然而，日本人爲何是崇高的國民呢？日本的政治家在歐洲人前來（亞洲）時，不只保留了繼承自中國文明的外表，而且保留了中國文明的精神。爲何中國人對於歐洲人的侵略，陷入全然絲毫一籌莫展的境地呢？我在這裡可以指出一個理由。那就是在身爲現代共和國的中國裡面，中國文明的精神形式化的學者，亦即讀書人、

受教育的中國人所取用的忠、孝（順）等文字，最終變成了乾燥無味的死文字。然而，對日本的受教育者，亦即對於士而言，他們保存了中國文明的精神形式，亦即「尊皇攘夷」文字的真正意義。因為這種精神的存在，在那個培里提督剛剛來到日本時，日本國民團結宛若一人，以手持刀，不但保護了他們的物質的日本的國家，更保護了從中國繼承而來的中國文明的神髓。其結果則是，也守護了日本文明的理想。」



